

上海论坛动态



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第6卷 第1期 (总第22期)
2012.09

新闻

- > 上海论坛(2012)隆重开幕
- > 上海论坛(2012)总结会
- > 上海论坛(2012)圆桌会议

聚焦

- > 上海论坛(2012)大会致辞与演讲

专题

- > 上海论坛(2012)嘉宾访谈

共识

- > 2012年上海论坛共识

信息

- > 上海论坛(2013)主题





上海论坛动态

《上海论坛动态》是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的公开出版物。其目标是扩大上海论坛在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的影响力，其内容涉及新闻发布、论坛专题、相关活动、重要事项和进程等，并对论坛的阶段性工作进行总结，以促进上海论坛的更好发展。

主办方

复旦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编委会

主任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朱之文	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主编

林尚立 复旦大学副校长

副主编（以姓氏字母为序）

陈建民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常务副主任
陈诗一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华 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姜义华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分党委书记
金 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行政室室长
李维森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陆雄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彭希哲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任 远	复旦大学国家建设中心执行主任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孙笑侠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吴力波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 军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执行副主编

陈寅章	复旦大学校长外事顾问
张 怡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
康泰硕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部部长

责任编辑

沈天音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钱斯蕴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执行编辑

李明镇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罗 倩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
吴 涛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丁常昕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新闻

- 上海论坛 (2012) 隆重开幕 02
上海论坛 (2012) 总结会 04
圆桌会议 “可再生能源：引导亚洲绿色发展之路” 05
圆桌会议 “世界经济结构转型中的自由贸易区” 06
圆桌会议 “全球金融治理与国际政策协调” 07

聚焦

- 开幕式 & 闭幕式大会致辞摘要
韩 正 上海市市长 08
郝 平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 08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09
崔泰源 韩国SK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09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09
-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朱 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10
James B. Steinberg 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院长 14
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
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18
中国外经贸部前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
Carlo Carraro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小组副主席 21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校长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25
- 闭幕式大会演讲
Paul A. Volcker 美联储前主席 32
Adam Przeworski 纽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36

专题

- 上海论坛 (2012) 嘉宾访谈 40

共识

- 2012年上海论坛共识 44

信息

- 上海论坛 (2013) 主题 48

上海论坛（2012）隆重开幕 >>



5月26日上午，上海论坛（2012）在上海西郊宾馆隆重开幕。上海市市长韩正、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韩国SK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崔泰源出席会议并致辞。开幕式由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朱之文主持。

开幕式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学院院长、美国前副国务卿 James Steinberg，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小组副主席、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校长 Carlo Carraro，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前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主持了主旨演讲部分。

上海论坛（2012）于5月26日至28日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未来十年的战略”。在三天的会期里，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代表汇聚上海，围绕主题展开广泛、多维和深入的研讨，并发表“上海论坛共识”。

本届论坛邀请到上海市市长韩正，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学院院长、美国前副国务卿 James Steinberg，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小组副主席、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校长 Carlo Carraro，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前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韩国SK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崔泰源，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美联储前主席 Paul Volcker，纽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Adam Przeworski 等多位嘉宾出席。

上海论坛（2012）下设十个分论坛。主题分别是：“经济危机深化中的贸易、投资与治理模式”、“国际货币治理的新使命：合作与共赢”、“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东亚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创业、创新与可持续管理”、“塑造新的东亚地区秩序”、“亚洲未来十年的法律合作”、“未来十年亚洲的城市化和城市转型”、“亚洲未来十年人口与社会发展的新挑战和新战略”、“未来十年东亚生态文明建设的因应之道”、“低碳、安全、增长压力下的亚洲能源供需体系变革”。此外，论坛还专门开设了“世界经济结构转型中的自由贸易区”、“可再生能源：引导亚洲绿色发展之路”和“全球金融治理与国际政策协调”三场圆桌会议。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上海论坛更加突出学界、政界、

业界互动的特色。论坛特别设置了圆桌会议，邀请新能源汽车、金融等行业的业界领袖一同讨论未来发展之路。青年是未来的主人，基于本届年会的主题，论坛特别邀请了具备卓越研究潜力和一定学术造诣的中外青年学生及来自上海各行业的青年领军人物，作为上海论坛（2012）的精英青年嘉宾参加论坛活动，把论坛打造成一个青年精英国际交流和学习的平台。本次论坛还特别就上海社会发展形成了政策建议书，体现了论坛“扎根上海、服务上海”的重要理念。

上海论坛是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经济论坛。今年是上海论坛的第七届年会，前后七届年会共吸引约 2300 名国内外各界人士出席。作为“学界、政界、商界”三方交流互动的平台，上海论坛以“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为宗旨，邀请各界精英领袖开展对话与合作，力求就当今全球经济和国际局势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开展研讨，为亚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建言献策。

上海论坛（2012）吸引了新华社、中国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新闻社、解放日报、文汇报、21 世纪经济报道、东方早报、上海电视台、新加坡联合早报、凤凰卫视、人民网、新浪网、

腾讯网等几十家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此外，上海论坛官方微博于第一时间告知论坛进程，发布论坛资讯，拓展了论坛与各界人士的互动空间；同时，作为合作媒体的新浪网为上海论坛（2012）举行了两次“微研讨”，分享有关专家的见解，并于会议期间在新浪财经频道提供全程网络图文直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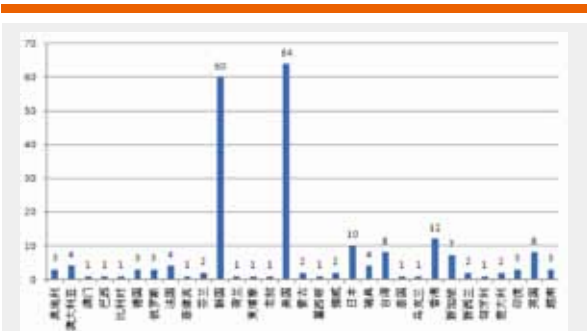
上海论坛（2012）总结会 >>



上海论坛（2012）总结会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上午在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二楼多功能厅举行。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各分论坛主席出席并发言，上海论坛办公室的全体工作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论坛组委会秘书长、复旦大学校长外事顾问陈寅章主持。会上，论坛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张怡先就会务工作进行了总结报告，主要包括上海论坛（2012）代表邀请、学术产品和媒体报道等情况，具体如下：

代表邀请：本届论坛实际参会嘉宾 530 人，其中，海外代表 217 人；报告场数 304 场；收到论文 223 篇。各项数据均创历届论坛之最。



上海论坛（2012）邀请来自世界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共 530 人

学术产品：出版历届上海论坛论文精选集三册，合计 123.36 万字；制作上海论坛（2012）分论坛研究报告二本，共 17.15 万字；团队合作，在分论坛研究和学者论文的基础上，发布上海论坛共识；形成政策建议书（复旦学者篇），递送至上海市府，体现论坛咨政的功能。此外，会议期

间，复旦学生专访 50 余位参会代表，请他们就未来十年的发展建言献策，由此编辑而成的学者访谈录将于会后出版；政策建议书（国际学者版）也将于会后出版。



多样性的学术产品

媒体报道：约 40 家媒体对上海论坛（2012）进行了报道，包括 21 世纪经济报道、环球时报、人民网、新华社、中国新闻社、解放日报、文汇报、东方早报、上海电视台等国内重要媒体，以及新加坡联合早报、凤凰卫视等海外知名机构；八条头版新闻，四次电视新闻，网络转载量达 794 篇；论坛主题关键词“未来十年”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随后，林尚立副校长做学术方面的总结，他指出，论坛应注重思想性，要创造“思考”和“交锋”的氛围；应在前期成果积累的基础上，重视后期成果的发掘；应坚持部分分论坛闭门圆桌会议的形式，保证研讨自由和深入地进行；应加强媒体沟通和管理；组织者应加强前期的研讨，做到对所处领域前沿的深入了解。

在之后的环节中，各分论坛主席先后做总结陈述，介绍各自分论坛的特色，分享筹备过程中的经验与得失，并对论坛今后的发展进行思考与展望。与会者一致认为，上海论坛应准确定位，明确其使命为研究亚洲、聚焦亚洲问题要有长远的发展观，着手后期产品的开发，并与亚洲各国领馆、智库保持沟通与合作；形成稳定的运行机制，保证日常工作的开展；应着力打造品牌，并整合校内外的资源；搭建平台，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学、政、商界的有效互动，为亚洲青年领导者展示风采和沟通交流提供机会。

会议最后，林尚立副校长代表论坛组委会，向所有为上海论坛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员表达衷心的感谢。

圆桌会议“可再生能源：引导亚洲绿色发展之路” >>



5月26日下午,上海论坛(2012)圆桌会议“可再生能源:引导亚洲绿色发展之路”在上海西郊宾馆正式召开。会议上半场主题为“亚洲新能源发展:全球视野与亚洲战略”,与会嘉宾包括能源与环境经济学家 Lewis M. Fulton 教授、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胡兆光、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陈新华等。

Lewis M. Fulton 教授表示,如果我们希望达到“低碳社会”的话,一定要做一些技术方面的革命。目前中国净石油进口需求依然强劲,这与中国汽车市场发展密切相关。目前中国13亿人口,2.3亿汽车,在未来还具备很大的增长空间,对石油的需求将继续增长。因此将对中国的碳排放将会产生巨大影响。考虑中国的碳排放问题,发展电动车是我们实现低碳化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中国希望到2020年的时候有200万的混合电力的电动车,其它的国家也都有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话,我们整个世界的电动汽车将会进一步进入量产,进入大众市场。

胡兆光教授以智能电网为出发点,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瓶颈和挑战进行了演讲。胡教授认为电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当前面临多种挑战,能源需求量大,进口石油风险大,煤炭使用比重也较高。应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应当在电力方面多做研究,以智能电网为切入点,以电力化节能减排。据预测,到2020年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去除将因为智能电网的设立产生。政府政策将在智能电网的建设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陈新华主任表示,在研究新能源的过程中,不仅要研究点的问题,例如新能源技术研究,更要分析线和面,集中在点、线、面三者的结合,全面发展可再生能源。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到可再生能源会对电力系统带来很大干扰因素和不稳定因素。

会议下半场的主要议题为“加速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

市场培育、技术选择与政策支持”。与会嘉宾包括韩国SK集团全球技术研究所总裁金东燮、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国家863电动车动力电池测试中心主任王子东、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研究中心主任符钢战、吉林大学汽车研究院副院长闵海涛、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动车委员会副秘书长孙立清、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电动车部部长刘明辉、北京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林逸等。复旦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力波教授主持了会议。

金东燮教授在会议中表示,目前电动汽车发展上有很多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电池的技术发展情况,电池的成本、安全性问题,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大大改善,但仍具备很大改进空间。电池技术是电动汽车发展的关键问题。

王子东教授同样谈到了电池的可靠性、安全性问题,并介绍了具体的电池安全事例。王子东教授就中国汽车企业的环境控制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应学习日本、韩国先进的企业环境控制,对电动车电池生产严格把关。

符钢战教授就“中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目标和路径”这一话题进行了演讲。他认为中国电动汽车的供给有两个重要的注意点,一是准产,二是供给瓶颈。在2015年前后,公务用车和商用车将成为电动汽车市场需求主力和启动点,而短途小型车将成为市场需求的过度点。

接下来,闵海涛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他对低碳汽车发展的看法。闵教授认为低碳汽车首先是必要的,其次,高等院校应在低碳汽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包括建立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校企合作等。

孙立清教授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起步很难,市场需求千差万别,企业创新举步维艰,而政府的行动空间很大。在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

最后,刘明辉先生和林逸院长从整车生产厂商的视角对新能源汽车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整个产业链还没有发展起来,对关键技术的突破将是重中之重。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电动汽车的技术发展是市场突破的动力。

在会议的最后,专家和学者对今天的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问题包括目前上海市的电动汽车推广模式,政府在电动汽车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电动汽车的未来发展前景等。专家们达成共识,政府应当成为电动汽车市场初步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2012年将成为电动汽车的发展元年。

圆桌会议“世界经济结构转型中的自由贸易区” >>



2012年5月27日上午，上海论坛（2012）圆桌会议“世界经济结构转型中的自由贸易区”在复旦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向阳教授、韩国经济研究所副主任 Song Wongun 教授、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Toshiaki Hasegawa 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许宏强教授、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研究院姚为群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何喜有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尹翔硕教授等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对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FTA）这一议题从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积极的交流与讨论。

李向阳教授发表了关于 TPP 对中国影响的看法。在他看来，TPP 是美国回归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力推 TPP，除了经济因素，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推广美国的价值观，防止东亚地区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一体化。在可预见的将来，成立 TPP 九国集团的目标较易实现，但若想进一步成立 TPP 十二国集团，则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对中国而言，TPP 在经济领域产生的排他性效应微不足道，但在战略层面的排他性效应不可忽视，如果 TPP 十二国集团成立，则中国所推行的东盟 10+3 很有可能陷入停滞。

Song Wongun 副主任针对新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实施贸易自由化战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状况不尽人意，而新兴市场国家却迅速恢复增长，带动全球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南南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也逐步提高。关于在东亚地区实施贸易自由化战略，Song Wongun 副主任认为中日韩需要鼓励东亚内部市场的发展，逐步摆脱对欧美市场的依赖，

这种以内需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可以使中日韩三国获得更稳定的增长。

Toshiaki Hasegawa 教授分析了在贸易方面 APEC 框架和欧盟框架的差异。欧盟的特点是先建立制度性框架，然后进行区域内贸易；而 APEC 的特点是先由市场自行生成该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规范和发展。更进一步，APEC 希望能够在 WTO 框架下实现 FTAAP，这需要中日韩三国的通力合作。

许宏强探讨了中日韩 FTA 的前景。中日韩已于 2011 年底完成官产学联合研究，并计划于今年年内正式启动 FTA 谈判。中日韩三国 FTA 的建立存在着不少阻力，一方面三国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欠发达，另一方面各国国内存在着敏感部门的阻力，此外各国政府的政治意愿也摇摆不定。中日韩三国可以先两两建立双边自贸区，并加强彼此间的产业合作，以此作为突破口最终达成三国间的 FTA 建设。

姚为群博士则从官产学联合研究方面展望了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前景。该联合研究从经贸关系、货物贸易自由化评估、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等方面对中韩自贸区进行了研究，并证明了建立自贸区对两国而言都是利大于弊，尤其韩方获益要大于中方获益。但自贸区谈判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韩国坚持对农业进行保护，而中国石化行业三大寡头极力反对化工品的关税减让，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双方政府做进一步的努力。

何喜有副教授分析了中国的 FTA 战略，他认为中国建立东盟 10+1 的框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发展贸易伙伴方面应该沿着从易到难，从近及远，从贸易自由化到其他领域合作，并注重保障能源供给的路线继续前行。

尹翔硕教授以机电产品为例分析了中韩贸易的密集度和互补性。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中韩两国机电产品的贸易联系密切，其密集度指数波动上升，同时，机电产品产业内互补性指数也较高，中韩两国存在着要素禀赋和贸易结构上的互补关系，建立中韩 FTA 有益于双方。

圆桌会议“全球金融治理与国际政策协调” >>



5月27日下午，上海论坛（2012）复旦金融高端圆桌会议在复旦大学光华楼思源会议厅举行。上海市领导、复旦大学校领导，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莅临会议，并在欢迎仪式上致辞。

高端圆桌会议为闭门会议，以“全球金融治理与国际政策协调”为主题，分为三个部分，议题分别为“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的挑战”、“国际政策协调与东亚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上海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出席会议并做主旨发言。

韩国成均馆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政府知识经济咨询专家金暎汉，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学术秘书长林曙，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日本一桥大学副校长、大藏省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小川英治，瑞典隆德大学隆德经济研究所教授、瑞典欧洲经济与管理学研究会主席Lars Oxelheim，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胡永泰等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了讨论。



开幕式 & 闭幕式大会致辞摘要



郝平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

面向未来世界各国需要加强经贸合作，更需要深化人文交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外开展人文交流，通过这些交流为与各国关系的发展夯实民意和社会的基础。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也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希望今年的与会嘉宾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务实合作，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韩正 上海市市长

在世界大调整、大变革的背景下，本次论坛以“未来十年的战略”为主题，探讨亚洲的应对之策和发展道路很有意义。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正在进一步地加快，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正在孕育，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的力量持续壮大。按照国家对上海的发展定位，上海将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之路，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做出上海应有的贡献。历史在曲折中前行，世界在变化中发展，困难中总会有希望，挑战中总会蕴藏机遇。我们期待通过上海论坛这一高端的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分享各位专家、来宾和学者的真知灼见。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变革与公正、合作与共赢，理应成为未来十年亚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展望未来十年，亚洲国家应该在经济贸易、货币、金融等方面寻求进一步的发展与合作，实现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发展。上海论坛期待着能建立起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要以学术的精神来解决现实的难题，用思想和智慧的碰撞来坚定迎接美好未来的信心。这里的交锋和形成的共识，将有助于向世界呈现一个蓬勃进取、和谐共生、稳定发展的亚洲。

崔泰源 韩国SK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亚洲国家应该携手共同创造财富，应该通过合作来面对危机、共同成长。上海论坛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能够让我们分享智慧，宣传我们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共同探讨、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本次论坛上，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广泛、深入、互动式的探讨，真正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一定能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能够提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而不仅是一次性的探讨。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对于亚洲来说，一方面，我们为自己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内涵感到自豪。但是现在的亚洲，却缺乏相互之间的有效沟通，所以我们需要举办的一个对话机制，比如上海论坛使我们能够交流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

21 世纪的企业不仅仅只关注创造利润，企业也应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也就意味着企业也应该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正如我在开幕晚宴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中国成语：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能够携手共同合作，我们就能够搬动大山。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朱 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首先感谢我们的主持对我热情洋溢的介绍，再一次感谢复旦大学对我的邀请，我也是复旦大学的校友，所以在这次能够回到复旦来也是很大的荣幸，也是很荣幸能够在此给大家简单地介绍几句。这次的会议讲到的是亚洲的战略，特别是未来十年里亚洲的战略，我会给大家讲一讲在一个变换的世界环境下亚洲的情况。首先讲变换的世界，世界现在确实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当然我不能把所有情况都给大家介绍，但是根据目前的一些研究，我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世界是怎么变化的，在这个变化的形态下，亚洲是如何融入整个世界的。

我们经历到了非常强大的激进的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都是这样，在过去我们看到了很强的GDP增长率，特别是在2000年的时候，增长非常强劲。这也是名义的一种增长率，实际的增长率我们四十年里GDP全球增长了4倍。这当然已经是老的信息了，我们再来看看贸易。这张其实是一个通货膨胀，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也带来了我们贸易的一个增长，如果你只看到贸易的话，它的增长更强劲，在过去四十年里，贸易的增长翻了十倍。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全球的贸易和内部

GDP的比例，大大地增加了。从四十年之前的11%到目前23%，所以说基本上是翻了一倍的。当然这还远远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些金融的资产，它的增长更加厉害，它比贸易GDP的份额的增长还要快。你看到这个曲线增长的速率更加强，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全球的金融情况特别是银行业在过去四十年里增加了14倍。

为了节省时间，在这里给大家看看所有的这些活动，其实都是有非常强劲的资金支持，当然资金的供应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也提升了14倍。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由于今天时间的环境，我不会一一给大家在每个方面都展开。来简单地总结一下，在过去四十年里我们经历了非常强劲的GDP增长，贸易的增长比经济的增长更强劲，那么金融的资产它的增长比GDP的增长还要快、还要强劲。而且货币的提供、供应量也是更加地增长。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金融的渠道，也提升了贸易的量。由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每一个国家和区域都通过不同的速率在发展，通过了不同的方法在发展，这都是我们全球的情况产生的巨大变化。

我们现在对全球的板块地图进行重新构架了，这是

我们全球的地理分布的地图，每天都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变化之后，这个地图会有一些很大的变化了，我们重新用GDP来衡量这个地图的话，就变成这样了。你可以看到最大的变化就是俄罗斯变得非常小了，那么小。那你看到以前俄罗斯那么大，因为它地理的占地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如果用GDP来衡量的话，就有了变化了。美国变得很大了，变成第一位，中国第二位，这是日本，韩国也变得更大，以GDP考量的话它在全球的版图上也变得更大。我把这称为全球经济的版图。如果说我们再用贸易来衡量，这个地图又再一次变化了，你可以看到美国也变小了一些，中国也变得小了一些，欧洲变得更大，大多了。当然在欧洲国家之间有很多的贸易量，如果我们把这些贸易量拿走之后，欧洲的这个板块也减少了，南韩还是很大，因为它的贸易量很大。在全球范围内南韩的贸易量还是很大，中国还是比较大，俄罗斯是这一块地方。

我们可以看看金融市场在全球是怎么样发展的，如果看这个指标的话，地图再一次变化了，这是我们的金融世界，这时候中国变得非常小了，俄罗斯也变得非常小了，欧洲的国家变得巨大，因为它们非常地庞大。当然美国也是很大了，但是欧洲还是最大的。那么大家猜猜这一块是什么地方？谁想猜一下？香港。因为这个地图就是由国际金融的交易量作为指数来划分的。这是日本，大家想猜猜这一块是什么国家？有人说是卢森堡，对。你很聪明，你的智商是220了。那么这个版图就再一次变化了，但是更重要的如果你去看看这三张不同的版图，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四十年里每个国家不同的变化，每个国家都朝不同的方向在发展和变化。当前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和金融联系得非常紧密，我们看到这个版图的话，我们会看到经济、金融版图的重要性，但是这还不是我们所有的情况。我们还看到地图朝未来的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下，每个国家之间是怎么彼此相连的。这里我很快地想给大家过一过国家的相互联系性。

这又回到了我们标准的一张地图上，这是全世界主要的一些国家，它们在过去二十年里彼此之间的这种联系有了巨大的变化。它们开始一些迁移，今天整个世界成为了三个主要的集群，第一个集群是发达国家，那么发达国家里面联系得非常紧密，这些发达国家总是联系得非常紧密的。那么接下来一分钟我会给大家看一看这会有什么变化，第二个集群是亚洲，我把它称为泛亚洲地区，亚洲现在也已经建立了一种垂直的工业链了，更多的国家现在也加入到亚洲的集群当中去了，你们可能不相信，巴西今天也属于亚洲集群了，智利今天也属于亚洲集群了，坦桑尼亚、南非这些国家都加入到亚洲集群来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亚洲的集群当中来，也成为了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工业链当中的一部分。第三个集群就是石油国家，你看这些国家都是不同的，这是尼日利亚、科威特、苏丹，他们由于有同样的特点，有同样的业务周期，所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三个集群有非常相似的经济周期，他们之间内部要有很多的相互连接性。这是全球三个主要的集群，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板块，这是我们今天的彼此之间的竞争，我们要了解这三个世界的集团怎么样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让我给大家看一看欧洲的例子。

如果你去看看欧洲的情况，这是欧洲板块，在欧元区之前的一个板块。现在变化了，你看到这是在未来15年以后，1984~1995年，那么这个时候在欧元进入欧洲之前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南部的中心，比如说是法国和意大利这一块的地方形成了一个中心。那么谁想猜一猜在北部的核心国家是哪些呢？谁都不想猜？并不是德国，根本就不是德国，而是英国。德国并不是核心，但是当欧元进入了欧洲之后，十年以后开始板块变动了，这是今天的解释。你看他们彼此之间，国与国之间联系得更加紧密了，所以欧元在欧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把所有的欧洲国家联系得更为紧密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国家彼此之间是怎么样联系在一起的呢。这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是整个欧洲，你可以看到希腊总是在外部、边界这边，来看看整个世界目前的核心。它会和其它的方面紧相连，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图。

让我们看一看另外一张图，这是全球贸易的集群的图。这张图里中国在这里，非常有意思，中国是处于核心。它和这个发达国家之间连得很近，德国、英国、日本等等这些发达国家都是联系得很近的，这是一个整体的区域，这里是一个垂直性的供应链。而今天其实在这个区域里是由中国作为主导的，特别是在制造业里中国是作为领头的，当然在这个核心区里日本还不在这里，中国在这面。右边是欧洲，这两个板块是有交集的，我没有那么多颜色，所以无法给大家显示这个重叠的区域。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在这里，中国和这些发达国家联系得非常紧密，因为它经济和贸易的能力非常强烈，日本和它们的联系稍微远一点，也是属于亚洲这个集群的，但是它和发达国家的联系没有中国来得那么紧密。这是另一张图表，这是机械的贸易，你可以看到它的核心还是中国、美国、德国，这些是核心国家，通过这些核心它会扩展到其它的一些区域，比如说中国扩展到亚洲、非洲的影响，还有美国对一些拉美国家也有很大的影响，过去的20年里，所有的这些核心国家都会渗透到其它一些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去。而核心之间变得越来越紧密，它们也会更好地渗透到亚洲市场去。

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在这里我无法给大家非常详细地展开所有内容，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另外一块内容，也是很有意思的。在这边我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在这里我把这一块的内容跳过不讲，讲下面一块内容。在这边还想给大家介绍的另一个内容就是随着世界的变化和移动之后，国与国之间有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你可以看到，跟过去相比，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而且有很多共同的移动、运动。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的资产回报情况，从2003年是20%，而现在这些相互关系是要超到80%、90%以上，所以说在各种资产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不同区里的资产的联系度大大增加了。再看具体的情况，这条绿颜色的曲线，拉丁美洲资产、

股市场还有这条是亚洲的市场，那么这两条曲线的运动在十年前是42%，而到现在是81%。你可以想象亚洲的新兴市场和拉丁美洲的股市场之间的联系是变得那么紧密了，为什么呢？因为拉丁美洲它更是亚洲供应链的一部分。

在危机之前在一些新兴市场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工业的输出可以对外部的冲击进行显示，过去只是占到一半，在危机之后它已经达到了60%，可以由外部的冲击所解释。那么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危机前20%，危机后达到40%。所以我们都更多地受到外部的一些冲击，不仅仅只是新兴的经济体是这样，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在过去四十年里非常强劲的经济发展之后，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在持续变化，当今发展仍是我们的主题。我们国与国之间变得更加相互联系了，而且建立起了三个集群，一个发达国家、泛亚洲国家还有石油的国家。在亚洲我们看看未来十年里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战略去发展，首先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亚洲的集群成型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呢？答案是还没有。亚洲的供应链还在持续不断地扩展中。而且将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亚洲的区域供应链当中，在过去的十年和目前的情况相比，这个版图大大有了区别了，更大的国家进入了亚洲的区域，而且不断地在吸引更多的国家，也创建了整个区域的很多机会。当然当亚洲建立更多的供应链之后，这个区域也会受到更多的一些风险的冲击和外部冲击的影响，我们都记得日本的地震之后，对整个供应链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泰国的洪水其实也造成了巨大的亚洲供应链方面的影响，乃至全球供应链方面的影响。所以亚洲当然也是在金融资产上受到全球的一个巨大影响，韩国的人士也向我们抱怨说，现在有了欧洲的危机，但是韩国和日本的波动要比过去的日元的波动来得更大，原因就是自己的输入、输出造成了很大资本市场的波动。

这里深颜色的是风险的曲线，资本输入、输出量巨大，当然对于指数也造成了相应的影响，那在未来的十年里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在未来的十年里在亚洲区域我们会看到几大问题，第一个是更一体化的供应链将会不断扩

张，将会更加垂直联系，而且向前推进，价值链会把发达国家推进更高端的价值链当中去，并且会使全球的制造业进行重组。我们也会看到更多的全球制造业的重组，特别是在未来五年里，我们会看到发展的速度在未来5~10年里会变得更快，亚洲当然是占到这个趋势的领头羊的作用。

第二个趋势就是在金融的行业里，将会有更多的改革，会吸收更多的资金，那么今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今年年底新兴的市场、低收入的国家，它们会占到全球GDP的50%。这也是在现代的人类历史上对于新兴市场第一次能够在全球的GDP当中占到50%，这对整个全球需求的公式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可以看到相关的范式也会得到改变。如果这些新兴市场能够占到全球50%GDP的话，但是它们的金融资产只占全球的19%，还有对于这些亚洲新兴市场可以看到，虽然它们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有大的提升，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个金融资产现在还是不够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未来的市场或者世界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后应该有这样一个回流的状态。也就是说从一些发达国家的资金慢慢地会流入到新兴的市场，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浮动性或者波动性肯定是会更大。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2008年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应该说2009年初的时候有大量的资金，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转移，而且包括在2009年还有2010年、2011年，特别是2011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大量的资金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这样一个相互的流动，而且可以看到利率的变化，还有包括印度的卢比它整个汇率的变动都达到25%了。对于我们总体来说，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比较好的信息，因为大量的资金其实都融入到或流入到了我们的新兴市场。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必须要在新兴市场上来进行金融的改革，特别是金融的透明性方面应该要进行改革。这样的话，才能容纳这样子的一个金融体量。

接下来就是服务行业，之前新兴的还有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以前都是靠出口来发展的，那我们必须要整个发展的模式转变为消费型的，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来发展我们的

服务行业。如果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整个消费领域的话，一定要开放我们的服务行业，这样的话才能有更多的就业的岗位。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服务行业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贸易或者是实物贸易方面，新兴国家已经体现出了自己的一个生产能力，但是对于服务行业来说，现在发展中国家还是远远不足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服务行业它们的整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正是由于它们占据这样一些服务的优势，所以它们也是希望这些发展中国家也能够打开服务大门，这样的话它们也可以更好地渗透到发展中国家。这对于亚洲地区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挑战。

当然对于亚洲地区来说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包含式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而且必须要实现更多的公平。这样的话大家才能真正地分享这些繁荣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我觉得这也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包容式的增长。

我想时间已经到了，最后小结一下，其实在过去的四十年当中，中国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贸易方面，全球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们必须要看我们的经济、贸易，还有我们的整个格局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各国之间的联络程度也是越来越大了，对于亚洲这一个地区来说，是一个泛亚洲地区，我们应该更大的范围来说，我们要更多的融入到供应链当中。泛亚洲地区应该是不断地发展，我相信在这样拓展的过程当中，会有更多的机遇，特别是对于制造行业，包括金融行业，对于服务行业的这样一个改革，更加地开放。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实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格局，也就是包容式的增长。好，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内容，谢谢各位。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James B. Steinberg

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院长
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上海论坛，在此非常感谢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进行创新性的思维。我们也会共同地来探讨一下我们的区域，以及全球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我来说，我已经离开了政界，现在是在学术界，但是也希望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像论坛主题所说的，思考一下为 21 世纪构建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亚洲，我们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上海论坛也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能够反思我们的历史。刚才我的好朋友朱民先生已经在这里为我们展示了一些表现这种变化感的迹象。我 16 年前陪同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访问过复旦大学，他在这里谈起他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前进的方向应该是怎样的，两年后克林顿总统访华来上海的时候我也做了陪同。在过去的 19 年中，我在美国政府中有这样的机会，对我们如何思考美中关系和战略以及东亚战略等问题发挥我的影响。不过，我想说明，今天我在这里的发表的观点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说的，并不代表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

在这个地区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这一点值得我们一再重申。四十年来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人们难以想象得到。

不过，对那些阅历超过二十或四十年，或是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他们还是有可能回想起，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有许多次，经济的力量和影响穿越太平洋，推动、改变了亚太地区。我出于谨慎补充这一点，是出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避免假设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定会成为明天所发生的，同时我们也要抵制住以当前情况对未来事件做直线投射的诱惑。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尤其重要，他们有责任不仅思考今天和明天，更要放眼长远的未来。当然我们也知道，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一个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未来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说到东亚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国的领导人，有很多变化，就以今年为例，台湾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化，年底美国和韩国也会有大选，对于中国来说，十八大也会召开。这些都是计划内的领导层改选决定，但也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件，例如我们近来在朝鲜所看到的。对于我们来说，也希望看到今年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调整，很多的一些变化。但无论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无论是非常重大的还是普通的变化，我们相信这些领导人的决策都会对东亚地区、亚洲地区、全球的格局有深远的影响，这需要我们持续来进行关注。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的格局当中，东亚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大，而且各国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多，我们必须要在气候变化等方面有更多的交流。我们也会看到各国的领导人会和各国在政治方面有更多的交流，这也是我们所需要倡导的。而且在未来几年，这些领导人所做出来的决定，对我们后代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应该说这些重要的关系，不仅仅中美，还有包括日韩、印尼、印度，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它们的决定都会对于政界、经济格局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说到亚洲的选择，不仅仅是它们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选择，相反，各个国家要首先考虑自己国内的问题，包括财政预算和政策、社会的福利、环境，所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国内的选择也会对国际的问题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事实上，在我们的国民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增长、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各个国家不可能是各自为政，而是通过评估地区内其它国家的地区战略来做出选择。其实，我们所在区域的大多数国家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受到对关键行为者意图的评估的影响。对美国来说，主要就是中国，反之亦然。韩国则要考虑朝鲜，还有日本、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是如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朱民之前演讲到的一样，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互交织，相互依存。也许今天以及近几年来，地区经历了相对平静的时期。之前二十世纪有很多血腥的战争或者斗争，现在尽管面临着风险，但我们更多地来强调稳定性。稳定性对于我们过去三十年内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我们一定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这对我们的继往开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今年即将上任的这些领导人来说，我们必须更多地考虑我们的战略稳定性，为什么我们能在这个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享有这样一个基本稳定的环境？地区内的领导人，尤其是美中的领导人必须要做哪些事来继续推动这种增长和稳定性？

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区的一些冲突，有很多原因，可能有种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民族认同、资源争夺的原因，或是领土纠纷、意识形态，其中有一些因素已经不再重要，但还有许多因素仍然在今天为短期

内的稳定带来潜在的阴影，甚至是绝对的冲突。以领土冲突为例，我们在这个地区面临的最危险的情况来自于尚未解决的国家 and 民族诉求以及相关的领土纷争——从朝韩的领土分类到日本北部的领土再到中国东南海一带的领土纠纷。几乎每一个地区双边关系都处于领土争端的阴影笼罩之下。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分歧是与其它长期冲突的根源紧密联系的，那就是自然资源和海域内巨大的潜在海洋资源。

但这些都并非冲突和摩擦的唯一原因。也有因为贸易和经济政策、政治和经济体制而产生的摩擦。因此，面对这些持久的冲突的根源，对认为地区仍然处于和平的直觉进行反思，我们再次强调其重要性。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回答常常是，至少在目前，所有的主要国家都有充足的理由来维持现状，而关于改变现状有足够的不确定性，这促使领导人持有一个审慎的态度，来支持稳定。中国的领导人尤其一直在强调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的重要性，它能够帮助中国实现长期的发展战略。但这种情况并不会偶然地出现，所以更重要的也许是，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确保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政策仍然是如此重要。

在亚洲地区，台湾海峡以及朝鲜半岛现在是可能是冲突最严重的两个地区。对于中国来说，希望能够实现祖国的统一，对于朝鲜半岛来说，我们也必须要确保整个和平的发展，无核化的状态。中国大陆和中国国民党现在维持了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状态。对于马英九来说，他现在也是决定不希望能打破这样子一个状态，希望能够继续进行探讨。韩国以及朝鲜目前来说，我相信没有人想冒这个风险来改变现在的状态。中国东南海地区也是一样的模式，尽管偶尔的冲突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当面对任何严重风险的升级可能时，各方都表现出寻求和平解决分歧的倾向。

是什么促使了这样的稳定性？我觉得要这个问题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在不断深化经济一体化，正如之前朱民所生动描述的。第二个方面，美中领导人之间相互承诺，会打造一个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尽管我们双方存在差异，并且因为彼此上升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挑战。我想强调后者，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经济的一体化可以有利于和平关系，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但仅靠它自身却并不够。我们知道，IT 的技术和现代化的交通不仅促进了贸易，也促进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建立，从而能够增加国家对每个人利益的依赖性。双边和多变贸易协定的链条越来越扩大，以维持政治关系来支持贸易的动力就更大，联系就被建立了起来。

所以现在所有人都能够认识到，维持繁荣最应维持一个积极的政治关系，它能够给例如货币和贸易实践中的经济矛盾带来缓冲。来自经济一体化的稳定也会影响政治的实践。对于不同的地区，政治、政党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为他们的公民从经济的角度来谋福祉，这是对风险的另一个约束。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现在也在不断地在繁荣、民主方面取得进步，政府能带来繁荣和美好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能够为政府获得公民的支持。然而我也强调对于目前的相关状况，不能自满，20 世纪的上半段欧洲也遇到了一些经济方面的困难，所光靠经济的一体化还不足以维持和平与繁荣。误解和误算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威胁稳定，尤其是在国家力量动态变化中的时候，即使在一些有很强利害关系来维护和平的地区都是如此。一战和二战中的警示应该为我们所有的领导人所牢记。

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我们必须要多方参与、展开合作。现在其实不止单一的因素在影响稳定，所以中美如何去管理双边高层的关系，不仅仅对于两国，对于我们这个区域和全球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奥巴马总统也把中美的关系称为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两国的关系了。自从二战结束以来，以及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地区内的中美关系的管理就有着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在此期间，美中是存在分歧的，地区陷入了战争和冲突。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访问中国，我们的关系慢慢和解和稳定化了，尽管重要的冲突仍然存在，但广泛的冲突已经避免了。

所以在 70 年代邦交正常化后，中美关系的管理或多或少是基于双方的理解的，尽管我们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包括贸易、经济政策、人权和民主治理等，可能双方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美国两党的领导人确实在言行上都表示欢迎一个强大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她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有着积极的贡献。同时中国的领导层也接受美国在东亚将会继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也会助力于亚洲和平和稳

定。在最近奥巴马总统对中国以及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双方都再次确认了这一点。双方都在采取很大的努力，希望能够求同存异，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区域和全球性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反恐、反海盗，以及全球公共卫生等问题上。

但近年来，双方已经开始挑战这种合作关系的基本前提，利用他们称之为“历史的教训”，声称量过注定是最好的对手，甚至也许是敌人。在美国方面，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声称，中国的崛起本质上是对美国的威胁。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零和游戏，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要以牺牲另一国为代价。在中国方面，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美国的存在，尤其是军事存在本质上是与中国的安全对立的，我们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是对中国不加掩饰的平衡和牵制力量。从这些言论中，他们主张和呼吁一种明确的政策诉求，对美国，要控制和抵制中国的崛起，对中国，要努力减少并最终消除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

如果我告诉你，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缺陷的，会令你们感到惊讶吗？而且他们所产生的那些政策选择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自我满足。如果中国的领导认为美国的目标是削弱中国，那么他们就会寻求阻止这一目标的政策，包括寻求旨在消除美国在地区中力量的政策，从而将那些认为中美关系是正面的人的行为依据变为无效。类似的是，如果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在试图破坏美国在地区中的积极参与，或者在恐吓美国的朋友，他们也会与我们的传统盟友建起更强的联系，来反对这种情况的出现。即使美中两国中那些相信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人，他们也在试图采取预防的策略来反对坏结果的出现，即所谓的“反向交易”。他们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会传播互不信任的种子，这可能会导致螺旋式的作用和反作用，也会让那些我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兑现。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不相信有一个铁律，中国和美国注定要成为对手。但是另一方面，我相信我们其实有一个良性的看不见的手，慢慢通过两国关系的交流，把我们朝有利的方向去导向。相反我也相信，如果缺乏有远见、有勇气的领导层，那么令人不越快的结果就会出现。

当然对于危险、风险的规避，双方都要能够去采取有勇气的决策。美国人注意到中国在言论上做出了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承诺，同时也对中国能否言行一致持有疑问。同样，在中国，我们的政策是否符合一个反复的说法，即我们要支持强大和繁荣的中国，这也有很多人质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两国的领导人的发言里都提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战略互信”，而做到这第一步就是要对话。

在过去的三年半里，我们也看到，我们两个国家在对话方面越来越深入，同时可以谈到广泛的话题，这些对话都是非常重要，特别是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明证。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对话是最为急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军事对话取得进展、建立了战略安全对话之后如此振奋的原因，我自己也非常荣幸成为了第一场战略对话会议的联合主持人。

对话仅仅是个开始，在对话的背后也要能够采取实际的行动，把我们传达的一些观点加以支撑。我把这种行动叫做“战略再保证”，双方都能够采取一些具体明确的措施，来确保我们的意愿与口头的承诺有很好的匹配、一致性。我稍微解释一下，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国决定来支持和维护中国入世这是很好的一个战略保证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采取了切实的行动去证明美国确实兑现了之前对增强中国繁荣的承诺。在中方这边我们看中国的领导层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也采取了很好的措施，在最近也就是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领导层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维护全球的经济福祉。现在，美国人也希望中国能够重新平衡经济，放宽货币限制，从而能够真正地保证中国并没有以其合作伙伴的利益为代价寻求持续发展。反过来中国也可以合理地期待美国来管理自身的财政问题，同时避免伤害到中国经济的利益和债券投资。

在安全方面，我们双方也需要采取很重要的措施，来打造双边的信任，方法就是通过采取战略的再保证措施。例如，两国都能够去采取措施，确保我们合法利用空间，不增加他国空间资产的风险。同时两国也可以制定一些标准、准则，使我们在网络空间的活动不损害或破坏对方正当的安全考虑或经济利益。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创新的做法，消除海上意外的危险。现在，这个过程并不会很容易。双方要建立互信，不是一天就能够建立的，因为对于很多重要的话题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例如在美国，我们相信过去对台湾国防和军

事需求的支持是能够促进海峡两岸的对话和稳定的。而中国却“强烈反对”这一观点，认为相反的做法才会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奥巴马总统也希望中国的人权状况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认为人权的改善将对中国的繁荣稳定有利，但是中国会把这视为是美国对于中国主权的干涉以及一种削弱中国的企图。

我们反过来也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和军事现代化怀有疑问，正如在南海问题上所见，我们看到了在和平解决争端上的不一致。我们常说“管理”两国之间的差异，但我们要做的更多。我们要毫不避讳地解决问题，并试图确保我们哪怕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所分歧，我们的分歧也不会被误解为敌意。我们还需要认清，在管理双边关系上，我们也需要依靠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关切点。担忧美中共同管理亚太地区听起来似乎是很离奇的，但是在很多区域内却是事实。同样另那些国家担忧的还包括被卷入美中矛盾交火之中，或是被要求选择支持一方，因为大部分乃至所有的国家都更希望和美中双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出于共同建立一个多边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格局的承诺，我们两国在治理双边关系上的能力会得到加强。这些多边的途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解决无论大小国家的广泛的利益问题，也为避免面对许多双边关系中都存在的“输赢”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法。

因此，从APEC会议上的东亚峰会到在东盟地区论坛以及更多非正式机制中各地区包括三边和其他对话的努力上，我们看到，今天，建立一个允许美中关系更加蓬勃正向发展的框架，我们都正在摸索和努力。

我希望，今天我的演讲分清了这条界线，一方面保持对维持亚太长期和平和繁荣的可能怀有乐观的信念，另一方面我也现实地提出了警告，就是我们也有无法成功实现我们共同利益的风险。但是我真诚地相信，像上海论坛这样的会议以及你们产生的对话将会使这个天平朝着更为乐观的方向倾斜。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个与大家探讨的机会。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外经贸部前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我记得六七年前当 SK 决定赞助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主持一个论坛，在北京叫北京论坛，主要谈论政治问题，在上海搞一个上海论坛，主要讨论经济问题。我曾经对复旦大学的校领导讲，我说你们一个大学搞一个上海论坛，在上海能不能通过，我都表示怀疑。因为一个大学居然把自己主办的论坛叫上海论坛，现在看来复旦大学做得很好，今天韩正市长亲自光临，说明你们这个论坛叫上海论坛也算正统。所以首先要祝贺我们复旦大学能够主办这么一个好的论坛，一个好的国际论坛。

今天我想讲一下经济转型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就是讨论未来十年亚洲的经济战略。讨论未来十年的经济战略，当然也可以讨论未来十年的能源战略、人口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等等，但是我认为在讨论未来十年战略的时候，最核心的是讨论亚洲经济转型的战略，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今后十年的核心，那就是经济转型。因为在过去十年，确实中国和亚洲的许多新兴经济体一样取得了重大的经济项目的进展。但是确实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实现经济转型的问题。

谈到经济转型，当然它的内涵非常丰富，有很多的改变。这些改变归纳起来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经济的增长从更多地注重数量到更多地注重质量这样一个方向的转变；经济的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制造业、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共同发展的方向来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过去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为动力到依靠投资、出口和内需，而且以内需为主导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企业的发展来讲，从一个以国有大企业为主导的企业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大中小微企业一起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转变。所以说中国经济转型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是我认为最核心的转变，就是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就是怎么样从一个以增长为主要目的的经济转向一个以人的发展为主要目的的这样一个经济。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

从这样一个角度衡量，我就觉得中国经济转型是不是成功，我看主要是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看人的生活是不是更加幸福，更加充满活力，另一个社会是不是更加稳定和更加和谐。所以归根到底衡量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一个是民生的问题，一个是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两个目标，就可以说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经济的转型。也就是说从以增长为目的，转移到以人的发展为目的。

我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主要是在2009年当中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民众都在讨论中国什么时候从经济总量上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当然从总体上来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我们正在讨论什么时候中国能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候，当时我在澳大利亚的一篇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也提出了三个什么时候：他问我们中国，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去留学，而不是送到美国和欧洲去留学；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的电影、听中国音乐、阅读中国的书籍；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中国的品牌，而不是美国、欧洲的品牌。所以这三个问题当时看了以后确实像一盆冷水泼在我们头上，对于讨论我们中国什么时候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使得这样一个问题变得非常非常地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当时确实感到这三个问题确实打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就是中国的经济什么时候能够从软实力方面真正地和自己的硬实力匹配，从而在世界上具有真正的影响力。

我觉得要实现这样一个目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加强中国人的发展，加强中国经济从增长为目的，向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么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现在大家都在很热烈地讨论，主要是怎么样增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从增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方面，我想是不是可以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做出努力。

第一从实体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化的载体方面，我们不能有更大的发展。最近中国一直在抓文化产业，实际上

在抓中国文化的实体，中国文化的物质的形态。所以我们能否产生更好的为全世界所接受的电影、音乐、书籍，我们的教育能不能为全世界的精英所能够羡慕、尊重，以至于他们把自己的孩子更多地送到中国来学习。所以中国要打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第一是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教育产业，这一点我想把它作为实体的文化，或者说文化的载体。

第二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文化，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文化主要是怎么样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很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以市场化作为目标的。但是现在我们大家越来越感到，我们在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文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我们现在依然看到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体，这样一个主要目标远没有达到。现在国家对于资源的分配和控制越来越强，从土地资源到资金，到各种各样的经济的资源，国家在分配这些资源的时候，仍然起到一个主导的地位，市场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主导作用；第二国有企业仍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高度垄断，所以使得其它所有制企业在经济发展的空间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第三政府的行政审批不仅没有大量的削弱，而且在最近几年有强化的倾向。这使我想到我们在中国入世十年的谈判当中，最脆弱的就是怎么样消除政府的力量，当时我们想我们入世是否取得的一些成就，但是这些成就正在丧失。所以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方面，怎么样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是我们在实现经济转型方面以文化为主要核心的一个重要历史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体制的文化。当然这样一个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必须有一个诚信体制来支撑。而社会的诚信体制所出现的问题更使我们感到担心。因此我们在建立一个文化的体制方面，确实也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第三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建立适应经济转型的价值观，非常赞成刚才崔泰源会长讲的价值观的问题，这是实现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经济转型的核心之核心，如果没有一批真正有文化的人来支撑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走很远。所以培养一批真正有文化的人，应该是说我们实现经济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培养有文化的人，当然包括我们复旦大学这样一些优秀的学校里面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但是这远远不够。一个有文化的人不是说他有了大学的文凭，他有了硕士、博士的学位，他就是有文化了。有文化的人必须是有一个真正的拥有核心价值观的人，有文化的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做好：

一是他知道怎么样正确地对待自己；也就是说一个有文化的人对自己会是自信、自珍、自律、自强的一个人，对一个国家来讲，对一个民族来讲，他就是一个有自信的民族，一个自珍的民族，一个善于自律的民族。

二是他怎么样对待其他人，也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样能够以一种谦恭的态度，以一种包容的态度，一种爱的态度，去对待周边所有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怎么样能够有一个谦恭的态度、一个包容的态度、一个充满了友爱的态度，一个慷慨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周边的民族、周边的国家和全世界的国家。

三是一个怎么样对待周围的环境，他是否以一种顺应客观规律、顺应市场价值的规律来从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作。他能否顺其自然，而不是和自然做对抗。他对全球的环境是不是像珍惜自己的环境一样。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在培养一个真正的文化软实力方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一批有文化的人。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真正地培养一批有文化的人，那我们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也会建立在一种被人尊重的地位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中华民族真正是一个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同时我们中华民族又是一个谦恭、对其它国家充满了热爱、包容、理解和慷慨的民族，如果我们对于整个社会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对整个环境是采取一种珍视整个环境，保护所有环境的这样一种态度，那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就会得到大大的提高。所以我说当然我们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我们

的教育事业，当然必须要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体制，但是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培养我们中国一批具有受人尊重的价值观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上海论坛应该着重在这样一个方面的讨论。这也就是为什么崔泰源会长和韩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希望在一个学校的基础上，来举办论坛，因为学校它的根本任务毕竟就是人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上海论坛如果能够坚守这样一个以人的价值，以人的培养，以人的发展作为它的核心理念，那么我们上海论坛就可以区别于其它论坛。而且在和全球最好的论坛，包括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所谓的竞争合作当中，能够显现自己独特的力量，独特的价值。所以我希望我们以一个上海最有名的大学作为主办方的这样一个论坛，打出自己的品牌来。就是集中讨论人的发展问题。当然人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经济关系，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的发展。我们应该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来讨论、探索人的发展问题。我认为只要人的发展问题解决了，国际关系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如果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人民相互之间都有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一种慷慨和关爱的态度，国际关系可以处理好，最困难的国际关系也可以处理好。但是如果缺乏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理念，如果是把所有的国际关系仅仅建立在一种纯粹的利益的利益的基础上，或者说地缘政治或者地缘经济的基础上，那么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的关系就很难建立。所以从我本人来讲，我对于上海论坛是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上海论坛能够不愧于是由一个全球最知名的大学举办的论坛，这种论坛才能够全球千千万万的论坛当中独树一帜，发挥自己最基本的品牌的理念，从而使上海论坛办得越来越好。最后我祝上海论坛成功，谢谢大家。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Carlo Carraro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小组副主席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校长

大家早上好，首先我想感谢杨玉良校长的邀请，让我在这个论坛上发言，我也想感谢所有的同仁们，让我能够在主论坛里介绍一下能源的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问题。我也很荣幸参与到今天早上的论坛中。今天会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话题是有关于气候变化的，其实这也是和我们各国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的，而且之前的演讲嘉宾也讲到了气候变化的情况。我想我们讲的话题都是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

关于这个话题，我主要是从我们的政策角度来进行分享。不仅仅是从政策还有从经济的角度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之后的分论坛也会继续地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政策的探讨来进一步地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的状况，现在的情况并不是令人满意，我们很多的会议包括最近的八国集团，包括华盛顿的会议，其实都讲到了气候变化的问题。对于各国来说，都是有这样一个承诺，希望能够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到目前为止也讲到希望在本世纪末之前，把温度升高的度数控制

在 2 摄氏度以内。

其实我们在匹兹堡还有哥本哈根等会议也都开过类似的峰会，大家都是希望致力于来解决这些问题。各国都是设定了 2 摄氏度的目标，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持怀疑态度的，不仅仅是一个可行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为止，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温室气体的浓度，我们可以看到 2007 年的数据，一直到 2013 年的目标。可以看到这些浓度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温室气体的浓度目前已经达到了 450PPM。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地来进行减排，压力也是非常大。当然我们是需要政治方面的这样一个政策，但是应该说还是不够的。其实原先这样子气候变化的会议，开始的目标是设定于 4 度，但是从政治、经济技术的角度来说，最后设定了 2 摄氏度的控制范围更加可行。关于这一目标是否可行，我们再具体看这一张幻灯片。

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刚刚讲到了 440、450PPM 的程度，在这样的目标下，我们必须大幅度地来进行减排，还有包括每年各个国家也有相应的政策导向。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把整个碳的存量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现在是 440 左右，其中整个二氧化碳是达到了 390，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我们可能会达到 450 这样的一个目标。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继续按照这个曲线可能会上升到 550PPM，如果真的达到 550，可能很难达到控制在 2 摄氏度的目标范围内了。

从政策层面可以从几方面来进行控制，一方面就是要进行减排，一方面各个国家需要携手共同来合作，特别是那些排放大国，它们必须要来减排。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些更加促进的这些作用，其实不仅仅是需要减排，而且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新的技术，增加这些氧气的生成。这样就可以来进一步地，不仅仅减，而且要增加我们的氧气生成。最后，当然，是要适应。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把温度变化控制在 2 摄氏度以下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全球变暖无论如何都会出现，我们必须要适应。

说到减排方面，其实以前这些措施并不是非常行之有效，各国到目前为止也是做了一些承诺，有关于 2015 年还有 2020 年有相关的承诺，但是我还是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如果要达到 450 目标的话，必须要非常短时间内采取一些非常激进的措施。但是你如果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的话，可能对于你来说，经济成本又会上升，如何采取两者之间实现平衡呢，也确实非常困难。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的协议。而且很多的措施其实也是有所延迟。现在还有许多的技术，我们也知道有些技术，但有些技术无法真正地实施。比如说核技术，因为虽然说可以减排，但是会有其它的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态势下，我们的这些措施，这些行为，还有技术到目前为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进，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难点之一。而且我们对能源的需求现在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如何来控制整个能源消耗的增加，也是一个大难题。

在这里，其实中国、印度还有其它的发展中国家，关于它们的排放量我是做了这样一个预测，你可以看看这边有两个绿颜色，你可以看到在 2050 年或者是本世纪末，如

果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从绿色的降到 2.2 摄氏度，要大幅度的让这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下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线，它是和这些黄色的还有和橙色、红色的有一个交叉，基本上是在 2030 年~2040 年会有一个交叉。特别是 2040 年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些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会降到和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但是如果真正要实现的话，我们的能源消费结构就要进行转变。通过这张表格，大致可以了解到，这个目标其实可能性是非常艰巨的。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如果不积极地进行减排，可能会像这个黑色线一样，在不断攀升。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另外我们可以看看，在能源领域当中，我们的一些投资情况。

因为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温度，整个能源结构也要发生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传统的技术，还有一些核能，还有一些可再生能源，通过这样一些技术的改进，新技术的推出，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来进行解决。虽然我们到现在遇到经济的危机，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在这些能源方面做继续的投资。但是整个进展的速度还是需要进一步地加快。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市场的格局，整个碳市场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我们需要在核能、可再生能源做更多的投资，目前为止整个碳市场也估计会在 2050 年之前达到石油市场的 6 倍。要达到 6 倍的市场规模，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艰巨的。在 2050 年如果整个碳市场超过我们的石油市场的话，那也意味着整个二氧化碳或者碳足迹的整个规模也会越大，其实对我们实现温度控制的目标也会增加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地来做这些投资，使得我们的整个碳交易的市场能够活跃起来。

这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全球的范围内，其实不仅仅是要在国家的层面上来探讨整个减排的问题，我们应该要具体到城市的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也推出了一些城市管理的方案。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实现更好的农业管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我们也看到在很多的研发创新方面，也做了更多的投资。我们的环境意识其

实也有更多的宣传，当然我们的可再生能源这样子一个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但是目前为止还是不够的。因为仅仅这些措施的话，要真正地实现我们的目标，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除了减排之外，我们应该还有其它的方案。也就是说要减少我们现有的不仅仅是要减少我们的新增的碳排放量，我们要减少当前的整个排放。也希望有更多的其它的一些氧气的生成是最好。

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排放的库存，现在要进行降低。这样的话也可以降低我们的减排成本，当然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要大规模地把二氧化碳的存量去除掉，这个技术现在还并没有。现在可以看到生物能源的情况，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也是讲到了我们如果要达到 450 的 PPM 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整个二氧化碳或者说整个碳的浓度要进行控制。如果能够通过生物能源的话，就可以能够帮助我们实现 450PPM 的目标，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目前所有的生物能源大概总共达到了一千亿的规模，那就相当于基本每个公顷是达到了 10 吨的生物能源的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生物能源的土地的应用，如果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把这个面积翻一番。

除了整个生物能源的土地面积应该增加之外，还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技术，还有创新的技术。我们从经济的角度、财政的角度来说，也可以有一些激励的措施。另外刚才讲到了一些项目的调整，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我们应该是很多的这些项目要根据气候变化的情况，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他们投资的一些项目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才能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采用怎样的减排措施，我们都必须要采取调整、适应的一些项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做调整，我们做这样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应该说我们不需要大量地这样一些投资。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可以在经济上更加有效益。

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各国完全统一的政策，首先一方面，我们无论采用怎样调整适应的方法，都需要先要采取这样一个减排。我们采用了这样积极主动的减排工作

之后，可以补充性地采用一个适应调整的方案。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气候变化的问题。通过几种方法能够结合起来进行采用的话，我们可以在本世纪末真正实现我们的目标。

这边也可以大致做一个总结，从我们的成本，我们的效益，我们的投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研究已经显示出来，我们如果要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其实应该说是可以进行很好的控制，之前的成本可能达到全球 GDP 的 1%。我们也可以看到采取的措施如果是减缓的话，如果措施不够积极主动，成本反而会更高。我们的成本是可以小于我们最后所取得的收益，所以从长远来说，这些成本的花费是完全值得的。

这是一个初步的分析研究的成果，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大量的进行投资的话，这些投资其实是可以应该说是有益的。我们再具体来看一下投资的情况。时间的关系我不一一进行介绍了，根据世界能源机构的测算，如果能够采取这些能源的投资的话，我们可以实现目标。在全球的层面来说，我们如果能够投资 4300 亿美元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来实现我们的气候变化的目标。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投资来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调整、适应的项目。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农业、水资源还有在健康、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方面，我们也相信有很多的资源来进行调整。

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创新，比如说在研发方面，我们也做过一些投资的话，我们有更好的效益。这些数字是不可能的，我们其实在能源的领域，全球的 GDP 大概是占到 2%，八十年代的时候只有 0.8% 的全球 GDP，在这些领域当中你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我们通过这些研发投资的增加，可以在我们的排放减排、气候变化的保护方面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应该需要更加慷慨一点。我们大体测算了一下，在能源投资方面，每年可能要花费 6500 亿美元的规模，所以对于各国的政策来说，其实大致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数据。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2008 年开始，现在这方面的投资也有所增加，所以对于气候变化来说，应该说还是行之有效的，所以需要进一步增加投资额。

从政治、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有哪些结论做出呢，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在如今不大可能提出一个非常激进，要求非常高的政策来进行一个短期的减排，这个不太合理。可能对于一个温和的国际上的减缓措施，是更加合理的一个策略。所以不同的国家可能同时也要去进行技术的研发，通过新的技术引入来降低排放的存量，同时不同的国家通过合作的方式，携手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样子至少能够尽可能与我们的目标不断地去贴近。所以从这个目标的角度来说，我们通过这个技术的发展，通过温和的国际气候政策的出台，通过各国的携手，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朝我们最终的目标尽可能贴近。

欧洲现在从气候政策方面也在采取一些重要的措施，欧盟的角度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个大洲，包括联盟，不断地从持续性的角度在过去的十年，推出一些气候的政策。所以与欧盟相比，可能其它的一些国家，现在也开始慢慢地去讨论出台可能的一些气候政策了。所以从欧洲的角度来说，它们所做的一些工作，也是比较简单，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首先它们会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出台了相关的碳定价的交易机制。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好地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状况进行修正。除此之外，欧盟也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些激励措施，帮助大家更好地采取可再生的能源，以及提高能源的效率。同时你看这些都是些基础性的工具加以提出，一些基本的策略在欧盟得到部署。特别是在东亚，我认为确实也有必要慢慢地去借鉴欧盟的经验，然后采取更多的措施。所以你看东亚，包括中国、韩国，当然在整个绿色的发展和投资的大潮中，也是起着引领的作用，帮助东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地提高能效。

另外创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欧盟其实对于创新是非常支持的，特别是欧盟最近所做的一些决定，以及相关的决策、决议的部署，在所有的欧盟成员国我们也看到，

对于创新欧盟是大力支持。

对于未来的挑战有哪些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尽可能地去提高能效。最近在华盛顿，人们对能源也召开了重要的峰会，因为能源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其实它未必真正会影响到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但是最近我们也对排放的数量进行了计算。也就是说从全球的层面，把所有的国家涵盖进去，如果 20 亿几乎 30 亿的人口，如果这是我们计算的一个人口的基础的话，可能几乎 30 亿人口它无法获得很好的一些能源。他们对能源的获得性比较糟糕，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未来你看这些目前还没有获得能源的人口如果未来获得能源的话，那我们排放可能就不仅仅会增加 10% 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一方面要有很好的政策的出台，另外我们还要分析一下，我们潜在的这样一个新增的人口消耗能源带来的排放增加的影响。所以通过能效措施的推出来分析它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是重要。我们需要更加清洁的能源，同时我们需要在能源分布和这个分配方面有一个更公平、公正的机制出台。从而更好地控制气候变化，当然我们需要各个利益相关方能够就合作的态度达成共识，可能在未来数年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大概是短期不一定能够达成共识。但是我相信现在人们在进行持续的创新，人们也在慢慢进行开始更多的合作，例如我们上海论坛就是很好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平台，进行探讨，帮助我们在气候政策方面做出更大的进展。谢谢大家的聆听。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袁志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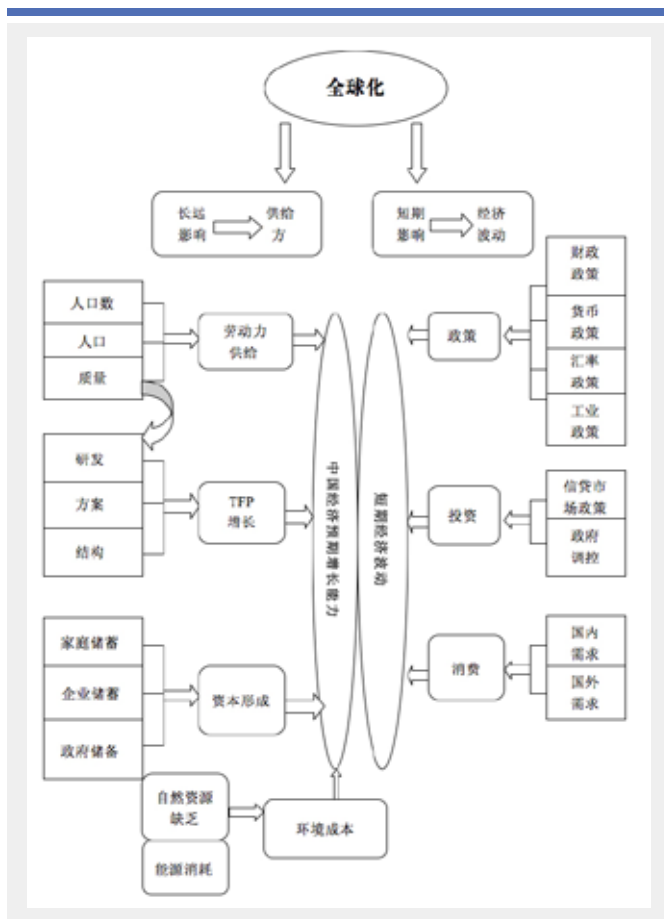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告。我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我个人认为 2012 年是中国经济非常不平常的一年，尤其是我们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碰到了很多比较强外部冲击和内部冲击，导致了经济增长数据下行。同时我们这个论坛今天的主题又是讲未来十年的战略，所以我要讲讲长期的问题。中国如果一看长期的情况，无论是从人口结构的改变，还是从资本形成，还是从环境、能源的制约，还是从 TFP 的增长都碰到了挑战。2012 年是一个长周期和短周期并存的年代，是相当困难的一年。今天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2012 年碰到的挑战，二是长期的趋势，三是大概有哪些重要的工作是近期必须要做的。

讲这么一个题目，首先还是要给出一个宏观经济学的一般模型，这是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来看长期、短期两个方面。从长期来讲，我刚才讲了，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后面的资本形成也是非常重要；TFP 里面我们有 R&D

的活动，中国这几年的技术进步非常重要；TFP 增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制度改革，刚才龙永图先生已经讲了，比如说加入 WTO 制度改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就是能源的制约，我们环境治理成本的制约。就短期来讲，我们的冲击有很多，比如来自于外需的下降，比如来自于中国投资的突然变化，比如来自于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过度频繁的变动，都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冲击。所以短期长期来看，2012 我们有很多重合的东西。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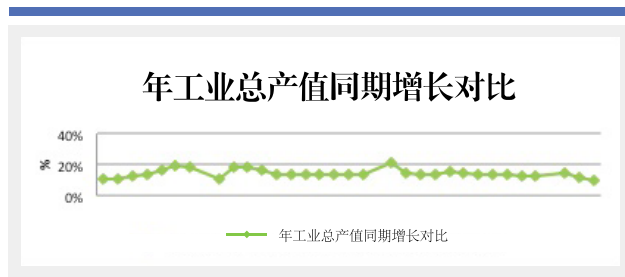


就 2012 年来讲，首先要看全球经济的影响，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第二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投资最近的变动；第三来看看消费；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金融，就是流动性注入我们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的变化。

从全球经济来讲，说老实话 2008 年这一场危机没有过去，2008 年这场危机刚才朱民先生已经讲了，由于全球经济的长期非均衡，就是制造板块的非均衡、贸易板块的非均衡以及金融板块的非均衡，最后导致的就是金融衍生产品，金融的杠杆太长，现在是一个不断去杠杆化的过程。就美国经济来讲，因为它的科技、因为它的重新再工业化的政策，这样一些政策的展开，以及国内的很多刺激政策，再加上美国美元还是国际货币体系当中一个重要一员，所以它继续举债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但是下面一块我们就看

到了很多问题，欧洲由于欧元这样一个共同货币的存在，使得少数南欧的国家经济复苏是极其困难，去杠杆化的任务就更重，继续举债的成本就非常高。尤其是最近，因为希腊的议会选举和法国总统的更换，那么欧洲正在朝着未来的目标，不怎么明确的方向蔓延。欧元应该来说我想长期来讲无非是三个出路，第一个出路就是欧洲走向联邦化，它的货币政策就更加地统一，现在的法国新总统提出来就是欧元债券的发放，试图征得一个美元那样的地位，就是举债负担比较轻，但是这个趋势估计不那么容易走成。第二个就比较危险了，就是希腊退出。第三个不能不排除长期欧元的解体。如果这个东西继续蔓延，欧洲经济估计在衰退的过程当中可能还要花上几年。

后面就是大家知道，原来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向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出口已经开始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但是最近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也是出了很多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全球资本市场对于未来预期的经济增长的不妙，前一阵大宗商品包括黄金价格大跌。那么这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一个影响，这样一个全球经济的不利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这个影响是应该比较大的。中国大家知道是个制造业工业比重非常大的，是个世界工厂的概念。但是就 2012 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少有的到了个位数的增长。4 月份的数据是 9.3% 的增长，大家知道这个数字在中国很多年的平均数字基本要在 14% 左右，中国经济还是比较健康的，现在已经滑到了，最近可以看到它的下滑是非常明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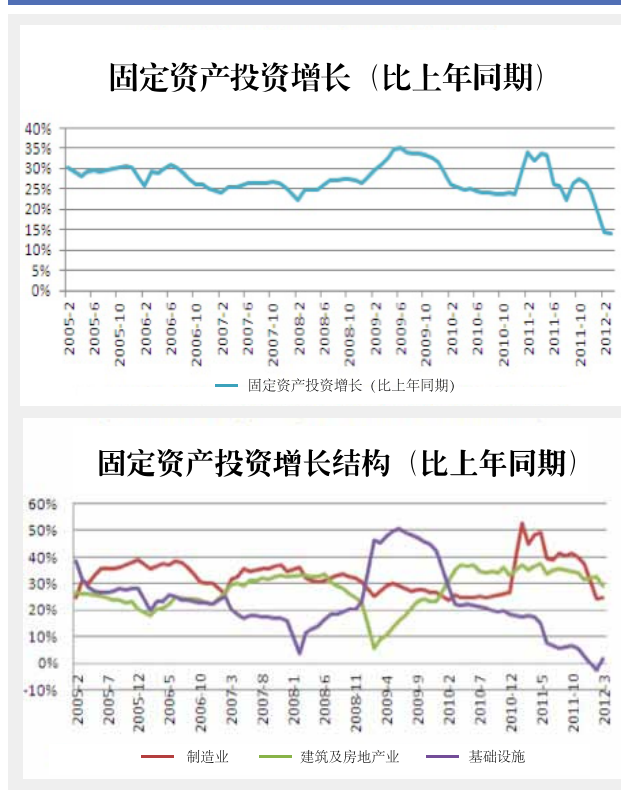
原因在于哪里呢？我们来看刚才短期因素里面的几个。原来长期一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的因素，就是外需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三条曲线，一条是出口增长率，一条是进口增长率，还有一条是中间产品进口增长率。可以看到中间产品的进口下滑趋势非常明显，而中间产品下滑实际上就意味着未来的出口还要下滑，因为我们中间产品进口，然后很多是组装再出口。进口也因为我们的经济速度的下滑而下滑，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下滑应该说2008年这一次我们已经开始了，那个幅度是比较深的。但是这一次的下探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经济速度的下降，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更深地去挖一下我们内部的东西的话，就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的出口的下降还要厉害。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出口的增长是非常快的，大家知道。像重庆是100%多的增长，那么这实际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说明了什么？我们最近集中地在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答辩，很多同学在做的东西显示中国的工业的集中度在下降，中国的工业的专业化水平在下降，实际就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的效率正在下降。前一阵到浙江开会，浙江现在是华东地区倒数第一，政府很自责，说我们没搞好，我说不是你们没搞好，是因为中国现在民营经济弱，所以浙江一定弱。民营经济好，浙江一定强，而不是政府有多少作为。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接下来看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原来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就是投资，从中国的投资里面，我特别要介绍的是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我们已经下滑到20%左右的水平。再看右边这三个投资的，一个是制造业的投资比较平稳，还有一个就是建筑投资，还有一个就是基础设施投资。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基础设施投资是这条紫线，2008年以后我们的四万亿有一个突然上升，但是这是不可持续的。这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当然这样的投资也带来了制造业投资的一个高升，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基础设施投资下滑特别明显，紧接着这条红线制造业投资也开始下降。我们还有一个绿色的线是建筑业的投资，在我们的限购政策之下，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民营的房地产的投资商基本上是没有投资了，既不拿地，也不投资。所以还有如此高的一个投资增长，完全是经济适用房撑着。如果一旦经济适用房下来，这个基础设施投资再下来，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一定再要下探。所以总体来看，很多人认为，中国2012年的一季度是个底部，或者有人认为二季度是个底部，我不认为一季度、二季度是个底部，恐怕三季度、四季度是一个底部。



资料来源：GTA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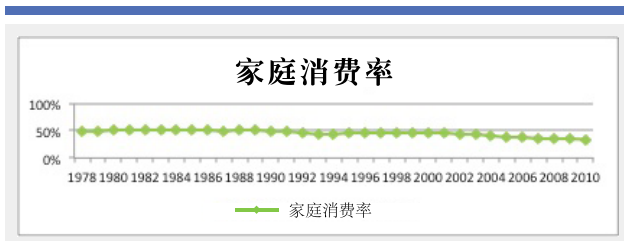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住房建筑里面，办公楼和一般住宅的投资下探，背后的原因大家就很清楚了，就是房地产的限购。房地产的限购我们就等着，我们做宏观经济的说再等上五年，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极难的研究周期的东西，因为这个冲击太强了。而且它不像其它的税收政策，或者信贷政策、金融政策、利率政策，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硬的，难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的冲击。



资料来源：GTA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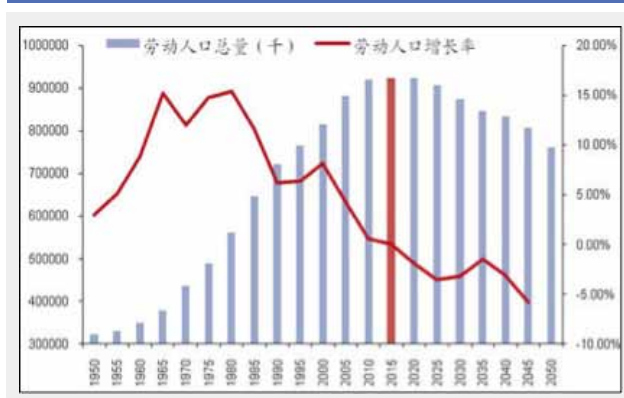
大家现在都指望于中国的消费，刚才龙部长也讲到经济转型、内需，这是非常重要的。将来可能是，我想 2015 年以后，中国的消费可能会上升，但是 2012 年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当你这个经济在下探，就业在下探，而且中国的消费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只有 34% 的情况下，我们的劳动收入在整个 GDP 当中的比重，只有 40% 左右的情况下，而且在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尤其是二元经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的公共产品享受都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要指望这样一个消费的上，2012 年我认为没有戏。所以我的潜台词也很清楚了，就是 2012 年如果经济要上去，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重新启动投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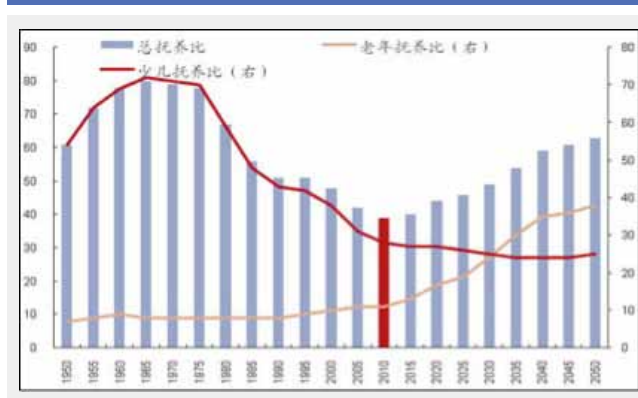
那么好，我们再来看，我们 2012 年存在的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挑战，就是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注入碰到了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在过去十年里面，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金融作为一种经济当中的血液，进入到实体经济有两个主要管道。第一个主要管道就是外贸顺差所带来的美元储备的增加，就是我们叫外汇转款这一方面注入资金是非常强的。现在外汇转款在迅速地下降，这一途径注入的血液就少了。而且这个对于民营企业是非常重要的，竞争性的民营企业出口主要以他们为主，所以原来企业，他不怕金融的问题。第二个管道就是房地产，以及在房地产基础上的地方融资平台，以土地作为抵押的进入，现在在限购之后，这个管道也堵住了。两个主要的管道一齐堵住，剩下的问题大家知道。实际上我们的一季度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松的，我们的准备金率是在下来的。现在唯一的利率还没下，负利率刚刚走出来，所以现在不可能有很大的利率下降的空间。但是货币已经松了，新的现象出来了，企业不愿意贷款，因为投资没有效益。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 5 月份的前 20 天，四大银行只贷出去 340 亿的贷款，2008 年我们是一万亿一个月的新增贷款，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流动性的注入下降。

下面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展开很多，我就下面再讲一讲简单的，对长期趋势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严峻挑战。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发生变化，中国因为七十年代起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我们的劳动力的顶部最高的大概到 2015 年，2015 年以后中国的整个劳动力人口占比要下来，总人数也要下来。这个大家知道不仅是劳动力人口的下来，而且劳动力的人口如果主体是 70 后、80 后甚至是 90 后、00 后的时候，带来了劳动力结构性的问题，甚至现在大学里的教育碰到越来越多年轻学生的时候，就发生有很多的变化。现在所有的独生子女都希望通过大学来进入白领阶层，但是我们的蓝领工人、技术工人，其它的工种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资料来源：联合国

人口结构的改变带来的另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所以背后还有一个中国储蓄率的巨大改变。我们的少儿抚养比迅速上升，老年抚养比迅速下来，这些都在动摇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可能中国变成如此高储蓄率的国家。这样变化对资本形成来讲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家知道最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靠高储蓄率的支撑，那么储蓄率有多少，我们就达到了 52%，这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国家都没看到过的一个这么高的储蓄率。这个里面再简单说两句的话，就是我们的企业储蓄，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的储蓄，不上交，成为了企业的储蓄，还有一个就是政府的储蓄。在未来长期来看，这些都是改变。无论哪一种改革的推进，比如说税收制度的改革，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还有人口结构的改变，都会使得储蓄率改变，资本形成下降，那么中国的经济再用投资增长来支撑，肯定是走不下去了，用劳动力增长支撑也是走不下去了，所以中国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唯一有希望的出路在哪里，就是技术进步，就是刚才龙部长讲的经济转型，就是我们 TFP 的增长。



资料来源：联合国

表 中国储蓄率

	2008 年实际值	2008 年预期值
家庭储蓄率	22.5	13—14
企业储蓄率	21.6	14—15
政府储蓄率	8.2	1.6—5
总计	52.3	28.6—34

数计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实际值）和我们的研究（预期值的计算）

因为我们去年给国家发改委做了一个课题，做了一项梳理，就是下面这条绿色的曲线，TFP 增长，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 TFP 增长有三个比较增长快的年代，第一次就是改革开放，农村承包制，第二次就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第三次就是中国加入 WTO。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它有什么共同的事实呢？第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制度改革非常快，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尤其是加入 WTO 以后的大规模转移。在和平时期我们转移了两亿多的劳动力，这个在历史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大家知道上海现在包括流动人口，我们的人口是 2300 万，最近跟计生委在做的研究显示，其实还有很多漏报，很可能要比 2300 万的人口还要多。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还有中国正在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到人均 GDP 到 15000 美元的时候，都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这一转折点对于日本来讲，大概就是 1970 年左右，韩国就是正好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后。那么对中国来讲，转折年大概就是 2012 年，转型可能是我们必然的东西。



还有 13 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国家，人均 GDP 如果超一万，到两万、三万、四万美元，不断逼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我们的能源消耗，我们的气体排放，我们的环境治理的成本，包括最近我们大量的企业转移到中西部以后，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从地理上来讲，它的土地是西高东低，都是水源所在。所以如果大量的企业转移到中西部以后，我们的长江、黄河污染了怎么办？而且现在在上海的天气，这几天你们在上海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验，如果刮西风，上海的天气不会好，如果刮东风，上海的天气是好的，因为上海的西部就是有工厂的地方。

那么怎么办，中国如何维持可持续的增长，就是说它的增长率下来，估计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再维持 10% 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下得很多，我们还是希望有 7%、

8% 的增长，我们增长的空间在哪里？空间我们也是很多，有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首先我们的制度的改革，制度红利非常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劳动工具，刚才讲了 2015 年劳动到顶尖了，但是我从来不同意中国另外一些专家所说的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了，中国还有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要转移，关键是制度改革给他创造空间。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农业只用了 2% 的劳动力，我们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还有多少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第三，我们的资本形成，尽管储蓄率跟我们前面比是下来了，但是我们跟世界上其它国家比，由于中国人民的这种特殊的消费习惯和储蓄习惯，我们还是有很大空间。还有一个我们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地区之间的差异。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不利的因素，我就不展开了，等一下我要讲。总起来讲我们要素市场扭曲的程度是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的改革接下来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素市场改革，但是中国最难的也是要改革。前三十年中国在商品市场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要素市场的改革举步维艰，因为要素市场改革背后要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个推动是相当困难的。首先一个就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大家知道我们 1978 年的改革始于农村土地的承包，但是承包制的集体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形式，已经严重跟中国经济后面的发展不相适应。因为集体土地所有，现在非常纠结的农村内部来讲，征人到底征不征地，减人到底减不减地，这是一个。第二后面的工业化、城市化用地，怎么跟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相匹配，地方政府在征地的时候导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我们的看法非常简单，就把土地的产权界定给农民，而且大家知道城乡的差距，真正大的差距，实际就是财富的差距，就是改革当中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土地的资本化当中，基本上可以说是农民没有获得这方面的财富效应。所以大家知道只要土地改革，它可以带来我们新一轮的土地产权的界定，而且中央我知道已经在做了。年初的时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把信息先搞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土地，登

记制度先做好，做完了以后，如果产权能够界定，后面大家知道不得了，这个时候释放出来的空间，对城市化的促进，对于金融的促进，因为金融要做抵押的，有抵押物资本化，这都是空间。刚才朱民讲到的我们金融是小国，这个金融跟实体经济是严重的不相称，香港的金融版图也很大，我们的金融版图非常小，上海的版图就更小了，如果哪一天把上海的版图做得跟香港一样大，大家想看我们复旦大学要培养多少学生，但基础在哪里？基础就在土地。而且这块土地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给农民，接下来城市化的进程也会非常快。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劳动力市场一定要统一，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的情况非常多，我们社会保障建设还有很多问题。这个劳动力的流动还有非常多的障碍，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最后，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国如果要做到把金融版图做大，如果金融的企业，金融的单位不强，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单位，如果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为金融市场服务的单位，中国的金融市场是永远做不起来的，中国的金融市场就是圈钱。我们的创业板一上市的时候是天价，完了就是下跌，把中小股民全部套进去。最近美国的 Facebook 上市的时候是 38 美元，最近跌了，开始小股东就要起诉了，认为承销商是有欺骗。我很想这样的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如果你上市的时候天价，后来就跌价，应该起诉。如果我们的金融、资本市场能够保护小股东的利益，那中国的金融就一定是健康的，因为金融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它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一定要为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一定要为风险投资服务，一定要跟年轻人结合在一起，用来自实体经济的利润回报给，而不是泡沫炒作，不是利益集团在里面掌控。所以要素市场的改革，金融市场的改革，对于中国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把这几方面的改革都改好了，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完全有信心的。所以 2012 年又是一个起始年，我们期待着 2013 年所有的改革能够重新再上轨道，然后抑

制中国经济这种下降的趋势，使得我们中国经济更加健康。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闭幕式大会演讲



Paul A. Volcker

美联储前主席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的介绍，同时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对我来说，这也是独一无二的机会，让我在闭幕大会给大家做这样一个主旨发言，我认为我们在过去三天的日程安排和讨论是引人入胜的，同时我也非常热衷于大家所探讨的话题。同时，我也期待着对我们探讨的全球面对的这些问题，能够在未来找到一些解决方案。当然，我相信大家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一些解决方案。

当然，我非常喜欢我们上海论坛的日程安排，同时也非常喜欢来到上海，在过去的几天，我在上海也是过得很愉快，我第一次来上海是在 1990 年，大概是 30 到 32 年前了，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上海。其实，当时上海和如今的上海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上海所取得的进步让我感到啧啧称奇。当然，不仅仅是上海，其实在中国各地都取得了很大的一个飞跃和发展，我认为中国现在确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取得的进步是值得关注的。现在中国从全球的经济角度来说，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了，

这一点大家非常熟悉。同时，我们在上海论坛也涉及到不同的议题，这些议题都是广受人们关注的。中国从经济事务的影响力，在过去的 30 年与日俱增，同时在最近的 10 年到 15 年，中国在经济方面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所以，这些经济的发展也表明我们中国确实有很好的活力。同时，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现在也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到全球的框架当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对全球一体化框架下的参与，推动出口，参与国际贸易，并且从西方国家引入一些技术。基于这种对全球活动的参与，抓住了这个机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此时此刻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带领着其它国家，希望能够继续再接再厉，抓住新的一些机会，承担一些新的责任，并且应对一些新的挑战，进一步发挥中国的领导力。

我这边花几分钟的时间探讨一下全球目前的现状。总的来说，过去的四到五年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尤其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体量也越来越大，全球正面临着金融危机，在金融

危机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很好地审视金融危机的原因。现在，对于我们的一些金融体系也带来了影响，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的影响。

现在，中国的一些经济也继续在发展，中国其实已经完成了新兴的过程，我们要把中国称为新兴过程完成之后的经济体了。对我来说，包括对在座的各位来宾来说，亚洲，特别是亚洲的中国，南美在全球的经济版图中不断在获得更大的地位，西方国家确实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带领着世界经济发展，但是在最近十年发生了扭转，不是发扬光大，而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新兴经济体带领着全球经济往前走。并且，帮助各个国家尽可能好地应对全球面对的经济危机，我也希望就这一点作稍微的探讨。

毫无疑问，中国的金融体系从发展的成熟度来说，其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和伦敦、纽约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通过现代的一些发展，华尔街，包括西方的一些金融市场也设计了非常复杂的衍生品，不同的金融衍生品和工具在15年前并不存在，但是我们中国现在还是专注于传统银行业的一些业务。你看最后的结果是传统的金融银行业务，特别是中国大规模的一些银行，在应对危机的过程当中表现的比那些西方的所谓契约衍生品支撑的交易体系要更好。当然，我们在西方也学习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同时中国也可以汲取一些经验。我们从中国所汲取的经验就是不要盲目地遵循伦敦、纽约的实践，我们要考虑到复杂性、透明度缺失、风险承担，西方的市场有以上的属性，结果他们不是促进了增长，而是阻碍了增长。如果你回到15年前，当时亚洲也面临着相似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亚洲的各个经济体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日本，包括东南亚、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90年代这些亚洲国家遇到了很大的危机，我相信

正是那个危机让亚洲国家学到了经验，现在以一种相对比较保守的传统方式，不断地积累着外汇储备，你看我们在建设这样一个栅栏，保护我们不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西方世界是相反的操作，西方世界在创造着脆弱性，积累着这些弱点，西方需要学到亚洲15年前的教训。

对于亚洲危机我也有一些观点，我认为当时中国仍然保持沉静，从而支撑了亚洲从危机中走出来。除此以外，我们也要记住，对于人民币的价值，大家也是颇为关注。所以，对于亚洲的危机来说，当时中国对于人民币的坚挺做出了承诺，基于中国的支持和贡献，也帮助我们的亚洲慢慢去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中国的贡献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后来慢慢关注到了国际货币体系，当然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我们在上海论坛的讨论中也对此话题有所触及，包括西方与亚洲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视角进一步往高层推。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可以看到，第一大经济体美国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但是目前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先进、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另外，中国的人口比美国要大很多，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强度现在也与日俱增，我们看一下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关系（中美）有什么区别，我们有着鲜明的对比，美国生产产品的70%都是国内消费，美国的消费超出了产量。相较之下，我们看一下中国对GDP的分析，中国国内大概对总的GDP内需有占到一定的比例，但是中国经济的体量非常大，不过消耗量是产量的三分之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和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中国其实也做了很大的投资，另外，中国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的贸易顺差，中国喜欢出口，美国喜欢进口和消费，这可能正好是天生一对：中国出口、美国进口。在最近十年，你看美国的消费比我们自己应该有的平衡点多了一个五万亿。当然，美国有美元作为硬通货去支付，中国

闭幕式大会演讲

通过生产、出口去获得外汇。另外，我们也分析了两国的利率水平差异，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做了美国想要做的，中国做了中国想要做的，通过国际贸易中国有很大的顺差，美国有很大的逆差，中国生产产品并出口，美国把产品进口。对于这样一个格局，很多人不想做任何的调查，正因此现在遇到了问题，因为这种格局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对于中国来说，不可能一直运行下去，对于美国来说，也不可能一直这样财政赤字下去。这样的话，问题不断深化，美国出现了问题，中国也要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一直进行出口，中国也不可能一直不断积累外汇储备，因为中国也有其它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作相应的调整，为什么我们要让这样的格局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呢？其实十年之前，当时我们在美国有 6 万亿美元，在国外投资，中国希望把这些美国所发行的资金全都吸纳过来，变成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希望能够继续进行出口，所以当时已经预见到了不平衡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愿意来打破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出现了这些问题。

两国都可以看到房地产有投机的现象，在美国也是如此，正是因为在美国房地产的投机行为造成了现在的经济泡沫破灭。在上海论坛，我们也讨论到了这些问题，在论坛当中，大家探讨了国际货币体系，在这样一个探讨之下，我们也是很好地讨论了接下来应该如何做一个变化。对于各个国家来说，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能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比如对于中国来说，现在也遇到了汇率的问题，现在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了，汇率其实对各个国家相互都会造成影响，如果各国的政策不统一、不协调、不一致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关于解决方案，我不是单方面要教你们，我只是一个建议。应该说对于我们现在和未来来讲，我们都有这样的挑战，我们也相信这个挑战对全世界都是如此。其实我们在上海论坛当中也听到了很多关于“第七主义”的说法，我们

也是探讨了亚元，还有关于亚洲地区化的话题，我觉得这些话题都是值得探讨的，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的话绝非易事。

探讨之后，我们也发现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在这里，我想关于金融危机再做进一步的介绍。与此同时，欧洲、英国也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型的银行也遭遇了问题，包括一些证券公司都遇到了问题。在危机到来的时候，2007 年、2008 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复杂的金融体系顷刻之间崩溃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制度还是在不断地继续，几十亿、几百亿的美元注入到经济体当中，支撑这些金融体系发展，这些钱投入到美国、欧洲，继续发展，作为这些救援的基金来救助这些大的经济体。当时我们也有争论，我们觉得大的金融机构不应该依靠政府的支持，因为这样的话，今后会遇到更大的问题，那今后怎么办？所以我们也探讨了金融体系应该是提供相关的一些保障，来促进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更多地关注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于欧洲议会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国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在座的各位也是了解多很多的金融机构、金融体制需要做一些调整，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商业银行做相应的调整。这些商业银行把你的钱吸收过来，商业银行以前拿了你的钱之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进行了很多的支付交易，但是这些交易都是由大型银行所完成的，所以我们要更多地关注这些银行的体系。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大的银行，还包括一些大型的企业，所以中小型企业其实也都应该参与到这个全新的体系当中。所以，整个大的环境应该有更多的保护制度，目前看到一些应对的措施，可能是政府管得太多了，如果是银行发现问题了，政府就提供资金，提供贷款来救助他们。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些功能保护起来。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只保护这些大型银行，其它的这些企业怎么办？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工具，我们现在有很多其它的金融工具。我们应该不仅仅只是关注几家，我

们应该要避免这些投机性的投资，我们应该要保护更大的其它的利益群体，全球都是如此。

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很多的衍生产品，完全都是一些人造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是希望能够反映出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现实世界当中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衍生品非常流行，而且可以很容易进行交易。全球的衍生品交易加起来可以达到 700 万亿的规模了！在真实世界当中，这样一个流动量，这样一个规模体量实在是太大了。其实在十年前，这些金融产品可能还不复存在呢，比如说我们的违约掉期办理。这时候你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它的一个设计就是希望能够保护公司，但是你要知道它当时希望如果出现违约，由保险公司来买单，所以把保险公司也纳入其中。十年之前还没有金融衍生品，而现在达到了 700 万亿的规模，这些资金是希望用于商业贷款、商业交易，提供这些保障，全球贷款的规模还不到 10 万亿，你可以看到金融衍生品的贷款体量比真正的贷款体量还多出 70 倍，不仅是保险加入其中，很多人往返做这些交易，如果遇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这些保单可能又通过其它的途径进行交易。

我们也可以看到，金融体系的崩盘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由这些衍生品所导致的。对于欧美来说，在这方面过于提出了衍生品设计，所以在我们的体系当中，前几天我也是参加了其它的会议，我们也是考虑了应该进行结构化的调整。但是结构化的调整也是不够的，我认为应该参与这些所谓的衍生品商业银行杜绝这些现状，商业银行应该维持自己本身关键的职能，而不是做其它的风险性交易。现在美国其实也是颁发了法律，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限制了一些商业银行从事交易。欧盟也是在讨论相关的问题，当然欧洲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亚洲，以及对于中国、日本而言，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亚洲并没有大量的银行参与到这样的衍生品或者投机的产品。你看美国、欧洲有很多的衍生产品，比如说自我交易的产品，我觉得对于亚洲来说，你

们应该维护商业银行的基本职能，如果你们能够继续保持基本职能，我们觉得可以继续发展。这样的话，你的结构可以更加简化，对欧美来说也会有商业银行简化的过程，这样可以维持自己应该做的本职工作。

除了银行之外，其它的行业也应该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的一些行业，可能看起来赚了很多钱，但是也有更多失败的例子。可能一开始的话，某些银行的失败没有对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主要是有商业银行这些风险的交易，如果有一个防火墙就可以有好的发展。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全球来说，除了刚刚提到的金融问题，我们还应该看到其它的问题。在上海论坛当中，有人也提出了这些问题，论坛中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好的论文。在探讨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全球的角度进行探讨，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我们不可能各自为政，我们也是讨论了除了金融之外，还有贸易的问题等等。

对于中国来说，根据自己的特点和规模，也应该是关注所有其它的问题，各国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各国都应该发挥自己的领导地位，这样的话才能实现一个和谐的全球关系。

未来的三十年，我不一定一直在这边，但是我可以想象出来，三十年之后上海和以前相比一定会有更大的变化，上海在不断地蓬勃发展。中国的繁荣昌盛和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和谐关系，我相信美国也能够解决自己本身政治上的问题，我也希望美国能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更加和谐的全球货币和贸易关系，相互之间有更好的沟通，大家也可以更好地携手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解决老龄化等等问题。

我这边探讨了对于中国、美国，以及全球的想法，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闭幕式大会演讲



Adam Przeworski

纽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在我的演讲开始，我不得不向主办方道歉，因为我的演讲是关于政治的，我之前没有意识到上海论坛主要是关注经济相关的主题。其实对于政治论坛，更多是在北京做。我的办公室是在四楼，是政治经济学的楼层，楼下是政治学，楼上是经济学，我在中间，所以你们看，学科的分界是很接近的。我上楼是经济学，下楼就是政治学。

当然我还有个严肃一些的理由，我相信经济发展从内在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我其实也是这样教我的学生。这要从六十年代阿玛蒂亚·森的一篇旧文说起，这篇文章叫做“隔离政治”。据阿玛蒂亚·森观察，如果我们某个经济体中的人看作是相互隔离的个体，那么每一个个体每一次都想尽可能多地消耗和消费，同时也希望每个个体都尽可能多地储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其他人储蓄，经济就发展，每个个体的可消费量都会上涨，这是一个集体次优化的选择，在有的期刊里也被看作是“囚徒困境”，但是这种情形经过一段时间后产生的结果，取决于我们

如何去管理和控制冲突。因此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是跟大家分析一下有哪些潜在的方式帮助我们去应对冲突。

我想强调的是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冲突，有些是收入分配导致的冲突，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冲突，包括宗教、民族性、种族、价值观等等，这些都是潜在导致冲突的来源。有时候比较微不足道的问题，就会引起人们的激烈情绪。在法国，国家队的足球运动员是否必须在开场之前唱国歌，公众对此有很多的政治讨论。这是个具有一定意义的冲突的主题，我想做的就是为不同的冲突处理机制提供一个纲要性的描述。我们会看到这个系统的优势和劣势，以及这些机制在什么情况下适用或不适用。我想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对政治机制进行分类，我并不想去贴标签，我想做的是更好地了解不同类型的冲突。你们和我想要的都是一样，可能我有你想要的东西，你可以从我这边拿走，你有我想要的东西，我可以从你这边拿走，这就会有冲突，我们如何去处理冲突呢？我非常相信，对于所有的政治系统来说，不同的冲突处理机制会以不同的

方式综合被使用，但是每种机制的要素都存在于每个政治系统中。这不是对政治系统的制度进行分类，而是机制的分类。

那么有哪些机制呢？其中一些我称为一元化的机制，否认冲突的存在，压制那些集体相关的冲突。还有一些是多元化的机制，它们会组织冲突，同时允许一些政治力量去进行相关的组织和调节。同时，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机制，包括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进行宣传，从而达到团结、压制，这种宣传通常还伴随组织选举招兵买马，从而进行机制化的调节。时间关系，用劳动力资本和劳资双方的谈判进行调节我们略过不提，但它们同列在我的机制分类清单上。

我先讲第一个特殊的机制，以宣传达到政治团结。我想强调，所有国家的所有统治者都使用这一机制。他们是如何做的呢？他们宣称，人民是团结的（这代表了十八世纪的西方政府成立的基石），整个社会没有重大的分歧，价值观和谐，同时，政治的生涯能够是基于共识去展开的，同时，合作优于冲突。这些口号，包括团结、合作、共识等等口号，充满了吸引力。如果大家都希望世界呈现出同一种状态，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管是谁做决定都没有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做同样的决定，同时你如何去做决定，通过选举或者共识表决的机制都没关系，因为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此外，政治的条件是自我实施的。无需别人来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没有必要进行胁迫，大家都会自发地朝着目标前进。那么，统治者就会通过追求国家利益而得到权威。请注意，我想说的只是，这些理念是在民主主义和共同根基的呼吁下被反复地提倡。我自己的女儿就读于一家法国幼儿园，里面的越南和美国孩子会被告知，他们的祖先都是六世纪被占领的法国国土上的幽灵。对共同的根存在着一种吸引力，庆祝国庆日、军队的荣誉感和国家足球队的表现等等，都是如此。

即使是在举行政党选举的国家，最后的当选者发表的第一个演讲总是类似的“团结演说”，美国杰弗逊总统在国家处于内战边缘、形式复杂的情况下所做的演讲就是如此，布什总统2000年也做了这样的演讲，弗朗索瓦·奥朗德两周前的演讲也是这样。我并不了解有什么系统的方法去判定它们的因果关系，但我认为，人们更看重的是真实和公正的决定，而不仅仅是那些规定和条例影响下的决定；是基于大部分人形成的决定，而不只是基于大部分条例而形成的决定；是有一定实质价值的决定，而不只是程序上的表现。

我想举的例子是，在每一个国家关于对机构信心的民意调研中，总有一些机构排在前列，例如教堂，还有一些机构排名垫底，区分人们对机构信任度的关键就是政府、政党和政治家。但我认为对统一、和谐和合作的宣扬是无处不在的，这充分证明了这些机构必然都是构成整体所必须的。现在，我只想强调的是，对于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有组织的反对意见是否给予容忍。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西方的一些人，当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机构慢慢应运而生，他们对于满足的立场可能也是有相似的看法，包括对有组织的反对，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泰德所说的，政府对于有反对意见的正常反应是认为它们在本质上是破坏性和非法的。

我还想讲一下美国宪法设计者麦迪逊的一些想法，他在宪法答辩词中的第一句话就写道，宪法的价值就在于能够防止派系即政治党派的形成。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也说了：“其实现在不同的政党让人们感到担忧。”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也支持一党制，因为团结使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目标，而如果不团结，就会产生出问题。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发表演讲指出，没有任何针对政府的有组织的反对意见是具有合法性的，如果有组织的反对，那危险就是

闭幕式大会演讲

他们可能想去赢得竞选，如果在竞选中获胜，就会有不同的政党，每个政党都会追求自己的宗旨而非维护“代表国家的意志”。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国家相关的团结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再看法国大革命，它为民主和自由奠定了基础。在1971年法国国民大会的最后说道，没有人可以被允许组织任何形式的反对活动，以一个集体的名义与政府进行对立。

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那些试图抑制反对出现的机制，可能对抑制反对意见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思考的方式是，首先有许多不同的个体，每一个个体有不同的禀赋，抑或是经济的禀赋、抑或是地位的禀赋、抑或价值观的禀赋，有些个体可能对当前的体系不满，这一种不满是个人私下的知识和认知，他可以在自己的私人网络中把他的不满传达出去。我认为直接这样表达的人有很多。这些体系当中的一些当权者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去阻止集体的反对。首先，通过宣传说服人们相信没有冲突、没有不满；第二就是压制，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把不满的个体核心沟通网拿掉；第三就是进行选举“招兵买马”，通过这种方式把一些要素重新分配，让人们更加趋于满意。

如果个体的不满涉及到在深度交流网络中人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找到是谁在跟另一个人交流，那么这样的不满是可以被容忍的。这个体系的问题是在于，如果采用压制的方式，很有可能把一些有用、有效的信息也压制住了。政府有时候通过讨论得出了政策，但是有一些政策可能是错的，如果是压制体系的话，可能就把所有的批评体系都压制住了，把政府错误的观点都压制住了。阿玛蒂亚·森关于美国饥荒的著作就是关于这个。它们缺乏对预见负面后果的信号式的功能。其次，也没有处理那些对政体没有威胁的矛盾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机制在面对冲突爆发时是很脆弱的。我在屏幕上列出这些，这里有一个小的反对，那里也有一个小的反对，然后随着这些反对同时出现并且反对声音直接存在稳固的沟通交流，就会爆发出来——我自己的

祖国波兰，正如你们所知，在1955年、1968年、1970年和1976年就经历了这些，冲突一次接一次地爆发。

关于进行招新选举的机制我不准备多说，只说一下当压制和选举同时出现的特殊情况。因为如果你想要成功地用选举招收新的成员，就必须减少那些不满意者的数量。问题在于，即便不是出于对一个突发危机的应对，这样的机制也会传播开来。马基雅维利在数百年前已经观察到，当一个城市已经陷入问题时，做出让步并不是可靠的方法，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当困难解决后，让步就可能被取消。所以可靠程度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托洛斯基曾观察到的，他说官僚机构在分配东西的时候永远不会忘了他们自己，这就意味着，选举很容易产生腐败。

刚才说的是一元论，现在我们看多元论，在多元化机制中，冲突是允许被组织的，但总是用某种特定的方式被组织，他们是受到控制的。所以它们根据一定的规则产生了一种相互作用，例如选举，它是多元的，对于整个选举来说，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大致有一个明确的预测，知道大致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各个权力机构之间可以实现权衡，在权力共享之外，还出现多党轮流执政。我想讲一下这种轮流执政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一个政党在选举中败选，它可能会想要斗争。假如一旦赢得选举，就能够永远或长期统治，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冲突的话，那么斗争的动力就会相当强烈。但是，假如你当选的时间只有四年。败选的这个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调整，在四年之后，我再一次进行选举。当然，再一次选举的话，败选的人可能还会败选，但是他们会进行一个深度的讨论、调整，在下一届的选举当中希望能够胜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我这边也想再次做一个强调，并不是说在多元化的体系里，一切皆有可能，并非如此。很多系统都控制着其政治的准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很多选举，完全要依靠你的资金、金融资源等，参政的成本极其高，可能是美国最昂贵的

行业之一。加入政治的障碍是巨大的，还有其他一些机构也减小了结果可能的范围，例如法院、央行、双议会，都是这样，所以并非一切都不可控制。

今天的时间可能比较短，我最后做一个小结吧。我60年代中期参加了一个全球的研究项目，当时有印度，还有南斯拉夫、美国、波兰这些国家的研究人员都参与其中。研究问卷里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你本土的团体中，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发现在美国有很多的冲突，然而在波兰共和国，同样存在很多的冲突——在哪里建造学校或医院，或在这里还是那里设立公交站点，等等。但受访的印度人却完全没有提到任何冲突。对他们来说，“冲突”这个词意味着互相杀害。印度人的字典里似乎只有和谐、合作或者杀戮。90年代初我在韩国时想到了这点，当时我和韩国劳工部的部长探讨，他也是非常反对非法罢工及暴力冲突，我跟他讲，这很容易，你就把这些罢工合法化嘛，他说，在韩国，要么是冲突，要么是合作，不可能有有限的冲突。我想要提醒在座的是，在200多年前西方人也是同样的想法。我们认为任何的冲突都是危险的，然而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了解到，冲突是可以被处理和调节的。多元化的冲突，如果它们提供了足够的动力，是可以维持和平的。当然，不是说这样一个方法和机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行之有效的。在一定时期内，确实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失败者必须怀有耐心地等待。但是我认为数百年来，我们早已学会了等待。谢谢各位！

(经速记稿摘录整理)

上海论坛 (2012) 嘉宾访谈



上海论坛 (2012) 年会期间，复旦大学的学生组成记者团，对部分参会代表进行了采访，听取他们对于“未来十年”发展的建言。他们中有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知名学者、有规划政策的政府官员、也有奋斗在一线的企业代表。站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起点上，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发展的思考与展望。这里选登部分代表的观点，完整的访谈内容将集结成《学者访谈录》，于近期出版，敬请关注。

陈新华

- 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主任
- “低碳、安全、增长压力下的亚洲能源供需体系变革”分论坛嘉宾

对能源的观念上，要从过去的过分重视数量向重视质量转变，努力提高油品的质量，稳定电力的频率和电压，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更为优质有效的能源。

未来十年中国的能源行业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能源产业作为重工业，不同于 IT 行业，遵循的是守恒的热力学定律，不太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个行业的惯性很大，只能够慢慢地逐步扭转。

华 民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 “经济危机深化中的国际贸易、投资与治理模式”分论坛嘉宾

从政府角度来讲，必须变目前的产业紧缩政策为产业扩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从存量的房地产和其他资产部门重新流向流量的实业部门，以便达到紧缩泡沫，增加有效供给和就业的目标，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从企业角度来讲，绝对不要参与高利贷金融活动，尽可能降低金融杠杆，脚踏实地做实业。只有当实体经济夯实后，经济才有平稳增长的可能。

上海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知识要素的驱动，前者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后者需要政府增加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因此，要实现上海未来的经济增长，首先需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政府要从经济增长的主导者变为支持者和服务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创新。

林金源

- 台湾淡江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 “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东亚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分论坛嘉宾

大陆经济的崛起，只要有对的制度，不犯太大的错误，经济崛起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文明崛起是不容易的，过程比较漫长。如何进行文明的过渡呢？不要让经济的发展腐蚀人心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要创造共同的货币呢？对于欧元区来说，欧盟这些国家想与美国分庭抗礼，这样在谈判的时候可以增加筹码。现在大家普遍预测，未来世界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亚元的局面短期很难做到，倒不如先把东亚内部互相的冲突问题解决，在资源开发上可以合作共享，那么整个亚洲的经济就可更上层楼，更融合在一起，这对三足鼎立的态势是有帮助的。

林逸

- 北京汽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 “可再生能源：引导亚洲绿色发展之路” 圆桌会议嘉宾

国家现在已经在电动汽车的示范运营中给予了很大的补贴，比如像纯电动轿车最多可以补贴六万，地方政府也要根据自己的财力给予适当的补贴，应该说，能够克服一部分电池成本高的问题，但是，作为企业希望，这样的补贴政策应该持续一段时间，而且，作为政府应该出台一些政策，大力鼓励充电设施的建设。

刘绍臣

- 台湾中央研究院环境变化研究中心主任
- “未来十年东亚生态文明建设的因应之道” 分论坛嘉宾

国家要把全球变暖作为真正的新的科学，对国家非常重要的科学，纳入整个国家政策的考虑。中国政府有很多资源，可以用在这种大型的调试工程上。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决心，意识到这是非做不可的事，那就可以做得很好。

Peter McDonald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统计与社会研究所主任
- “亚洲未来十年人口与社会发展的新挑战和新战略” 分论坛嘉宾

如果中国担心人口增长问题的话，那么可以采用“二胎”政策。这非常简单，但即使允许百姓生育“二胎”，也不能保证出生率的上升。因为像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平均生育率是低于1的，还有很多丁克族。

所以中国必须考虑到养老绝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职责。因为正是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青年人沉重的养老负担。

上海论坛 (2012) 嘉宾访谈

Chung-In Moon

-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
- “塑造新的东亚地区秩序” 分论坛嘉宾

我们难以想象东亚社会缺少了中国的参与。也许到目前，中国并未表现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因为领导者意味着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商品。但是在未来，东亚区域间的高速合作将会是最重要的一点。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没有了亚洲，世界经济将难以维系。

小川英治

- 日本一桥大学副校长
- “国际货币治理的新使命：合作与共赢” 分论坛嘉宾

如果你要问我“亚元”出现的时间，我只能说，这会是个非常长、非常长的时间。欧元区的经济危机是缺乏政府的监管而导致的。而我们提倡的亚洲统一货币是在各国政府的监管下进行。但是，人民币无法成为 AMU 的核心货币，因为人民币波动幅度太大，包括汇率也一直不稳定，建立 AMU 的条件之一就是我们需要价值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人民币不具备可兑换性。

朴仁国

-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 上海论坛 (2012) 闭幕式致辞嘉宾

目前，亚洲各国都呈现一种区域性的结构。我认为亚洲经济的一体化的进程还处于初发阶段。我们需要多加研究亚洲经济一体化，避免亚洲一体化走向失败。

我相信加强中韩文化教育学术方面的战略合作，不仅能在量上也能在质上使中韩关系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所以我想在这些领域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认为中韩关系的发展对今后的东亚一体化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James B. Steinberg

- 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院长；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
- 上海论坛 (2012) 开幕式主旨演讲嘉宾

我们的领导层应当使公众相信即使全球化存在一定代价，但如果我们真的走逆全球化的道路，情况将会变得更糟。

中美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两国国内和两国交往方式间存在多股势力，可能会导致冲突。若视而不见的话，两国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会很高。所以，唯一有益的方法是加强合作的决心，将我们的目光放在长远的、宏大的目标上，严正承诺，防止冲突的爆发。

如果中国想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话，就必须表达其扮演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角色的意愿。

Paul A. Volcker

- 美联储前主席
- 上海论坛（2012）闭幕式主旨演讲嘉宾

我认为中国的银行系统将会从市场竞争中受益良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支持国有企业运营的银行应当转向小型私有企业。尽管离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已经卓有成效了。

薛澜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 “创业、创新与可持续管理”分论坛嘉宾

市场不完善，是对创新最大的制约。例如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最基本的。第二、降低企业进入门槛，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垄断行为。第三、对不规范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如环境污染，知识产权侵权等。此外，改善融资环境、建立比较完善的信用体系。这些都是完善的市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觉得解决社会监管问题，科技的创新，不如制度的创新。归根结底，还是要完善我们的社会监管体系。

叶嘉安

- 香港大学城市研究与城市规划中心主任
- “未来十年亚洲的城市化和城市转型”分论坛嘉宾

上海可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上海现在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其阻力源于中国外汇市场的非浮动性，得不到国外的投资。但是上海作为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已经做得十分出色。

如果有一天美国不是世界了，而中国的人均GDP从3000美元上升到10000美元左右，那么中国就是世界了，上海就是世界金融中心了。

2012年上海论坛共识



金融和经济危机正以新的表现方式在全球各地发酵，世界各国虽制度禀赋各异但同受其患。危机使世界经济地理发生显著变化，亚洲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日俱增。未来十年，亚洲的发展将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亚洲自身也存在着诸多急需求解的难题。这就要求亚洲各国积极推进转型发展，加深、丰富和改善亚洲内部的合作，为亚洲经济增长和文明进步提供新的可持续的动力。本次上海论坛着眼“未来十年的战略”，正是以此为主旨，为亚洲的整体发展，缓解世界困局，寻求智慧和共识。

► 一、未来十年世界和亚洲发展的基本态势

我们认为，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秩序和亚洲秩序的深入调整期，也是亚洲力量整体崛起的重要历史机遇期，继续积极应对危机仍然是当前亚洲发展面临的基本挑战。面对挑战，需要各国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货币体系改革，在能源等领域不断突破，探索属于亚洲的发展之路。

第一，发挥各国政府对于亚洲危机的积极作用。

本次危机起源于康德拉基耶夫式的长周期调整，

危机的触发机制是最终债务人（美国次级信用购房借款人）的普遍违约。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的政府有两种选择：拒绝救市，那么危机就有可能演变成萧条，这是各国人民所无法接受的；为了避免萧条就必须救市。但是，政府为防止经济走向萧条采取救市的政策并不一定能增加就业，也可能无法激活民间投资，从而不得不依靠增加债务来获取救市所需要的资金。

面对不断深化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共同采取理性的行动来解决有可能导致危机继续恶化的重大问题：通过有效的全球融资和必要的改革，消除主权债务危机的不利影响；通过扩大市场开放度，推进贸易自由化；通过适度的资本管制，控制短期资本流动；通过教育发展和福利制度的改革，增加社会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弹性；通过激发企业家信心，实现创新。

第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促进世界经济秩序调整。

自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深陷“特里芬两难”之困境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发挥的流动性、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的平衡功能有所弱化；同时欧盟地区因为经济周期向下调整速度的加快，以及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从而让欧元也无法

承担起世界所期待的由超主权货币所带来的支撑全球经济的“货币锚”机制。

在世界“货币锚”逐一消失的同时，主要发达国家为挽救本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不得不放任各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各种由短期投机套利行为引起的动荡不仅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而且还重创了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些国家因为不恰当的金融与货币政策成为国际游资的攻击对象，从而遭到了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的双重打击。不仅如此，像中国这样拥有大量美元和欧元资产的东亚国家还面临着财富严重缩水的风险。基于以上事实，改革当前危机重重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显得刻不容缓且意义深远。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两种可能的路径选择：一是促使美元重新承担起世界公共品的功能——即为世界各国货币提供“货币锚”、为国际金融活动提供流动性和稳定性功能；二是建立一个新的以“特别提款权”为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即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有必要指出的是，不管是维持当今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改革切入点，还是以更能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利益的储备资产“SDR 机制化”为改革方向，达成全球共识和强化国际政策协调都是首要条件。

第三，有效突破能源约束推动经济增长。

随着亚洲经济迅速发展，亚洲能源需求急剧增加，其区域内能源供给却未能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从供给角度来看，亚洲的能源既有总量短缺的问题，又有结构失衡的问题。亚洲国家在能源消费和供给上的这种失衡使得亚洲经济增长中的能源需求必须通过外部市场来加以平衡。但是，外部世界提供的能源环境并不友好。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愈演愈烈

的国际能源市场的金融投机，再加上对高碳能源之使用严格加以限制的政策不断推出，已经造成了亚洲经济增长的红利大规模地流向具有能源金融优势和新能源技术优势的国家，以及非煤炭类的能源出口国。这对于大部分正在展开工业化的亚洲国家是不可忽视的重大挑战。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的风险评估显示，由于亚洲农业人口众多、农业集约化生产水平低以及土地、水、能源等自然资源匮乏，气候变化对于亚洲的影响将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为了有效应对这种挑战，亚洲国家必须选择一条适合亚洲实际情况的能源发展道路。就亚洲大部分国家仍然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而言，低碳路线必须要在动态考量经济、社会总体成本、收益的前提下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在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下，低碳经济仍然是一种高成本经济，大部分处在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的亚洲国家仍然缺乏必要的投资和相应的收入水平来支撑对高成本清洁能源的消费。因此亚洲的低碳转型首先应着力于对现有的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供应体系进行清洁化、低碳化的改造；其次才是从亚洲实际出发，在本国技术支撑、市场基础和制度设计日益完备的情况下迎接发达国家的新能源革命浪潮。在此过程中，亚洲各国政府应致力于低碳技术、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多边合作，建立常态化



2012年上海论坛共识

的资源环境政策协调机制，共同促进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节能型制造业的发展，增强亚洲在能源等大宗商品领域中的定价权，避免增长红利的流失。资源环境安全不可分割，合则共利，分则俱损。共利需要共识与合作。共识需要交流，合作需要坦诚。亚洲各国需要这样的交流与坦诚。

▶ 二、未来十年亚洲发展的战略性选择

未来十年，经济社会结构的大幅调整及地区经济关系重构，将是亚洲发展的重大主题之一，亚洲也将因此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促进未来十年亚洲的发展，一是要推动亚洲不同国家的发展转型，各个国家应根据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推动自身结构性转型，并构成亚洲的整体性发展转型；二是要推动亚洲国家间的合作，努力形成更加具有主导型和互补性的区域合作机制；三是推动亚洲领先城市和技术创新，以此带动亚洲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体系的合理构造，特别是通过不断创新，促进新兴战略产业的培育和成长，推动区域产业分工格局的重塑。

实现十年亚洲的繁荣发展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亚洲国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

第一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亚洲国家人口状况的



基本特征是总量规模大，并存在巨大的国别差异。亚洲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整个亚洲经济版图的重置，全球制造加工业极有可能逐步向劳动力更为低廉的中国内地以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面对区域内人口结构与随之而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亚洲国家应当作何反应才是可取的呢？作为人口还在高速增长的正南部亚洲国家来说，充分利用现有人口红利是理性的选择；对于已经或者正在走向人口老龄化的东亚国家来说，则应对现有的劳动与福利制度加以改革，借以达到增加劳动供给的目的。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发展教育特别是终身教育，提高供给总量趋于下降的劳动者的生产率，以便通过劳动效率对劳动数量的替代来维持可持续的增长。

第二是充分利用城市化红利。基于规模经济的工业生产具有空间集聚的内生性要求，因此工业化必定会带来城市化的发展。推进城市化发展不仅是工业活动的内在需要，也是创造需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亚洲的城市化红利仍然非常丰厚，但是，问题就在于亚洲国家通过怎样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才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城市化红利？

借鉴拉丁美洲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失败经验，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亚洲国家需加强社会投资以推动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具体地，亚洲各国政府应继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供更加有效的产业发展平台；应降低城市经济活动的社会与经济成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应加强对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项社会投资，促进城市文化转型和文化整合；应提倡紧凑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应推动人口自由流动，打破城乡人口流动的行政壁垒。通过这些方式，既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制度的变革和转型，保障



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第三是充分利用制度创新红利。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原因，亚洲各国的社会转型程度、速度不一，制度创新的空间极其巨大，制度创新的红利还未得到有效发掘。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亚洲一些国家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发生在部分亚洲国家的这种社会变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持续进步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那些尚未实现社会转型的亚洲国家提供了有益参照。另一方面，导致亚洲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与制度，因此，通过社会文化与制度创新来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将成为全面提升亚洲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 三、亚洲的持续发展需要合作与和平

亚洲经济社会秩序的调整伴随着日益增强的内在竞争和摩擦，这使得为了推进亚洲整体发展而言，维护亚洲和平、促进区域合作显得尤其迫切。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亚洲国家非常有必要在经贸金融、民商事务、知识产权、环境资源、司法协作等主要领域加强法律合作。为此，亚洲国家有必要在区域金融和金融法律合作方面形成

制度化、常态化的多边机制，以稳定各国合作的预期。法律合作的手段可以采取国际“硬法”治理模式，也可以选择国际“软法”治理模式，当然还可以是上述两者有效结合的混合模式。

促进亚洲合作，需要亚洲各国在世界和亚洲秩序调整中积极有效地管理矛盾和冲突，排除各种有可能加剧矛盾的干扰，尊重各国的重大利益，协调各国发展策略，为亚洲发展创造和平和稳定的内外环境。世界和亚洲长期发展的经验证明，平等积极真诚的合作，才能使亚洲各国各得其利并实现整体发展。

本次上海论坛代表一致认为，未来十年，亚洲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亚洲发展比任何时期都需要维护地区和平、加强内部合作、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各国应坚持合作与创新，努力推动发展转型，进一步提升亚洲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一个属于亚洲的繁荣发展的世纪！

上海论坛（2012）共识经复旦大学教授团队合作，精心打磨完成，于论坛闭幕之际由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朱之文宣读并发布；

完整版共识刊登于2012年6月4日《解放日报》第10版（新论），标题为《未来十年：推动亚洲整体转型发展》

上海论坛 (2013) 主题

主 题：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 亚洲智慧：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

时 间：2013 年 5 月 25 日 (周六) — 27 日 (周一)

地 点：上海

规 模：国内外学、政、商三界代表约 400 人

上海论坛 (2013) 期待您的支持与参与，

论坛最新动态请登录上海论坛官方网站 www.shanghaiforum.org 或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hanghaiforum> 查询。

关注亚洲

聚焦热点

荟萃精英

推进互动

增强合作

谋求共识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电话：86-21-55664590 55664665 传真：86-21-55670203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